民國叢書

第二編

·72·

歷史·地理類

中國歷史散論　曉風著

中國歷史論集　呂振羽　翦伯贊　華岡　吳澤　哲夫等著

中國史論集　翦伯贊著

中國史論集（第二輯）　翦伯贊著

上海書店

中國歷史散論

曉　風著

作者自序

這本集子包括三篇論文，即：(一)論中國歷史翻案問題，(二)歷史爲什麼是科學和怎樣變成科學，(三)論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阻滯的基因。(二)(三)兩篇爲舊作，曾在「羣衆」半月刊發表，最近偶翻舊稿，覺意猶未盡，乃略加增補。第(一)篇：論中國歷史翻案問題，係作者一年前在國立××大學任教時受同事與同學慫恿所作，寫成後亦祇交少數同事與同學大略閱過，迄未公開發表。篇中所論，爲中國歷史學中十分重要，而又尙少系統研究的問題，即故取爲全書命名。

這本集子的編成，完全是出於書局的督促，臨時彙集而成，說不上是體系之作，但却有其相互關聯。要想完成中國歷史的翻案工作，使中國歷史從僞造與歪曲的深淵翻過身來，亦即從剝削者壓迫者御用與奴役之下解放出來，變成人民的歷史，一方面需要變革歷史的社會基礎，同時又需要變革歷史本身，使之走出神學與玄學，而進入科學的研

究，使它變成科學的中國史。在這個意義上說，第(二)篇正所以補第(一)篇之不足，而第(三)篇則特別提出和第(一)篇有關的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癥結問題，更深入地加以研究和檢討，使中國歷史翻案問題，得到具體的發揮。

『社會是什麽，進步是什麽，從這樣的問題出發，就等於從終點到始點。在你們還沒有特別研究一種社會構成，不能確立這個概念，不能研究眞實的事實，不能在客觀上分析任何社會諸關係的時候，你們從什麽地方取出社會和進步一般的概念呢？』筆者當然不能說，這本集子已足以囘答這個問題，但却想根據這個提示，做一點具體的發掘，至於成功失敗，那祇有付諸讀者評判了。

一九四六年元旦試筆，華崗於重慶。

目次

一　論中國歷史翻案問題



一　歷史可以揑造嗎？

爲着改造現在和爭取將來，必須熟悉過去。對於過去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加多懂得現在，也越有把握改造現在和預測將來。但我們所需要的是眞實的過去，即眞實的歷史，而不是僞造和歪曲的歷史。

歷史可以揑造嗎？——對於這個問題，一般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家是給以肯定答覆的，而科學的歷史家，則堅決給予否定的答覆。本來，歷史就是過去的事實，這些事實既成過去，便成鐵案。人們常說：「事實勝於雄辯，」想憑空揑造和刪改歷史的事實，那豈不是最無理也是最愚蠢的事嗎？但法西斯的宣傳家却不這樣想法，他們總以爲歷史的事實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而隨便編造的。他們不管歷史事實的本來面目如何，只想

利用歷史來證明法西斯統治下的秩序是最合理的，並妄想證明法西斯的道路，就是歷史所規定的最好的道路。他們不但強迫本國人民服從它，因此把它自己的國家民族弄到萬刧不復；而且還要強迫別國人民接受它，不惜用武力來推行法西斯政策，挑起並擴大侵略戰爭，因而造成屠殺人類的空前浩刧。

但是這種法西斯主義的想法和做法，頂多只能暫時收到蒙蔽一部份人使之盲從法西斯的效果，因爲西洋鏡終究要被拆穿，歷史不能長久被欺騙，正像民衆不能長久被欺騙一樣，想靠揑造歷史欺騙人民來維持反動統治，想用侵略戰爭來創造什麼新秩序，只有心勞日拙，結果沒有不失敗的。莫索利尼、希特勒與日本軍閥，都已先後受到正義的膺懲，不能逃脫覆亡的命運；至於那些東施效顰，至今仍想玩弄歷史與壓迫人民來維持它們自己專制統治的歷史罪人，如果不願改絃易轍，順應民主潮流，那也只有自取滅亡而已。

我們堅決反對揑造歷史和玩弄歷史，並且反對借用任何理由來替揑造歷史和玩弄歷史的行爲作辯護。也許有人這樣設想：剝削者和壓迫者想靠揑造歷史欺騙人民來維持反

動統治，固然不能饒恕；但歷史既有推動人民作解放鬥爭的作用，那末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却不妨捏造一些有利於革命事業的歷史事跡，以便鼓舞和推動廣大民衆參加解放鬥爭。我以爲這種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錯誤，而且不能容許的。因爲我們要使人類歷史眞能發生推動解放鬥爭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須要所根據的歷史事實是完全眞實的。如果所根據的歷史事實，已有捏造之嫌，或至少是不完全眞實的，那末前提既經落空或錯謬，論據必然喪失客觀眞理的意義，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經很少可能，那裏還談得到鼓舞和推動解放鬥爭呢？

歷史本身就是一種科學，而科學必須實事求是，不能容許人們說謊行騙。假如認爲爲了「訓練」與「教育」的目的，可以歪曲歷史事實，或者在某種程度上修改事實或增減事實，那就是離開了科學的立場，否定了客觀眞理，而一切離開科學立場與否定客觀眞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害和錯誤的道路。

二　中國歷史的眞和假

中國歷史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自然有不少眞實的部分，但僞造和失實的成分，或許還更多些。有人說：『中國史籍有百分之八十是虛假的，』這種說法雖不免出於主觀推斷，但中國史籍中據有不少僞造和失實的成分，却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中國史籍的失實，僞造與删改的成分很多，先人已有很多發見。例如王充在「論衡」「儒增」「藝增」諸篇，就曾舉出古書上所謂『堯舜之民，比屋而封』，『武王伐紂，血流漂杵』等，都誇張過甚，與客觀事實不相符合。其中有一個例子舉得很有趣，證明那些御用史臣怎樣無恥的爲邀寵主子而僞造史實：『光武皇帝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止三人。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王充爲東漢時人，故稱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自益多矣。』（「藝增」篇）

按孝文皇帝，名恆，爲漢高帝中子，初封代王，諸呂伏誅，太尉周勃等迎立爲帝，在位凡二十三年，是爲太宗。通孝文之世，有南粵王趙佗之稱王，有吳、楚、趙、濟南、膠西、膠東、菑川等七國之叛，有誅鼂錯之獄。這些客觀事實，已足證明「斷獄三人」之說爲如何虛妄。除此以外，我們還可舉出很有力的反證：文帝六年，梁太傅賈誼上疏有云：「進言者曰：天下已安且治久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卽諛，皆非事實，且非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世，何以異此？」無論實證和反證，都可充分暴露賁光所謂「終文帝之世，僅斷獄三人」，完全是無中生有的妄言，賁光如此笨拙的僞造史實，甚至連光武也不好意思不加以否認。

除王充以外，淸代崔東壁在其所著「考信錄」中，對於中國歷史記載失實之處，也曾提出許多質疑，玆引數則於次：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唐人衛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

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説，遂謂韓退之作李于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磺。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者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附會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也。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爲許渾。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爲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嘗有十倍於此。且以顏闔之事，載於顏淵；闞我所爲，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尚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移於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恆所殺者爲宰我。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書言如此，夫豈無所據而妄記者？」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爲乙，終古不白，豈可勝道哉！」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

爭之。此無他，但狥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漢之書，故妄爲是言耳。劉知幾「史通」有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宋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按「史記」所載攻趙者爲屠岸賈，非韓氏，此處疑劉知幾有誤——引者註），有程嬰杵臼之事；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欒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書；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覯晉靈作台，累棊申誡。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特前此未有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辯之耳。』

中國史籍不僅眞僞混淆，而且常常僞造的顚倒眞實的，簡直需要重新寫過。正像魯迅先生所說：『中國學問，待整理者甚多，即如歷史，就須另編一部。古人告訴我們：

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大有朝氣，明則無賴兒。此種物件，都須褫其華袞，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爲烟瘴氣，莫名其妙。」「在歷史上的記載和論斷，有時也是極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爲通常我們曉得，某朝的年代長一點，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點，其中差不多沒有好人。爲什麽呢？因爲年代長了，做史的是本朝人，當然恭維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別朝人，便很自由的貶斥其異朝人物。」

在這裏，魯迅先生不但揭發了中國史籍虛假的現象，而且接觸了中國歷史失實的一部分原因。關於中國歷史失實的原因，向來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我們在講到如何翻案之前，必須對於這個問題有淸楚的了解。

三　中國歷史失實的原因

魯迅先生認爲別朝人可以自由的貶斥其異朝人物，自然說出了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眞實；不過，嚴格說來，所謂別朝人可以自由的褒貶其異朝人物，也還是極有限度的。因

爲歷史常常是現實的鑰匙，任你把眞情如何的藏在保險箱裏，加上幾重金鎖，外貼封條，但總瞞不過歷史這面鏡子。再者，歷史雖然不會是完全雷同地反覆，但是，在某些共同的社會條件之下，歷史也眞可以和現實酷似到可怕的程度。例如有些作家筆下的史劇和歷史小說，可以常常被認爲影射，怕你照出他的尊容，結果就不許你出版和演出。事實上，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永遠表現着過去的殘餘，現在的基礎和將來的萌芽，在歷史具體的事件中，過去的成份與將來的成份，往往交相錯綜，尤其是在沒有經過澈底變革的社會裏，如現在中國，那就更負荷着非常沉重的歷史因襲重擔。我們所處的社會，除了近代生活所特有的種種痛苦，還有許多歷史因襲的痛苦，壓迫着我們。這種事例，眞可以說是俯拾卽是，現在姑舉兩件司空見慣的實例如下：中國有多少小媳婦曾經慘遭婆婆的毒打，但到小媳婦變成婆婆的時候，却又大多把自身所曾遭受過的虐待，施之於下一代的小媳婦；又有多少徒弟曾經遭受過師父的虐待，但到徒弟上升到師父的時候，也大多把自身所曾遭受過的虐待，施之於下一代的徒弟。這種現象決不能祇看成是個人的不幸，更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有它深刻的社會根源。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直到現代爲

止，中國每一代的統治階級，差不多都還承襲前一代統治階級的衣鉢，至多在方式上變更一些花樣，而在實質上則往往如出一轍，或更變本加厲。汪逆精衞在「七七」抗戰以前當行政院長的時候，就曾嚴禁人民貶斥秦檜、張邦昌和劉豫，正是因爲在汪逆精衞身上，有着秦檜、張邦昌和劉豫底靈魂的緣故。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像秦始皇、明太祖、曾國藩和袁世凱這些專制者與喝血魔王，雖然形體已亡，然而他們的靈魂，直到現在也還有人在承襲着。不難了解，這種種歷史因襲的痛苦，是中國舊生產方法依然殘存的結果，而這種舊生產方法的殘存，自不免產生種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這種時代錯誤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如果不從根本上加以變革，別朝人也就不會讓你自由褒貶其異朝人物。魯迅自己也曾舉出滿清皇帝不但不許你批評他們自己，而且不許你批評金人侵宋（因爲清帝爲金人之後裔）。例如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爲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却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人閱讀，希圖改變中國人的腦筋。

嘉慶道光以來，珍重宋元版本的風氣逐漸盛行，也沒有悟出乾隆皇帝的『聖慮』，影印宋元本或校刊宋元本的書籍很有些出版了，這就使那時的陰謀露了馬脚。譬如「琳琅祕室叢書」裏的兩部「茅亭客話」：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庫本．同是一種書，而兩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關於『華夷』的處所，即四庫本把一切提到金人侵宋的事件都加以删改，如果我們把影宋本的「茅亭客話」和四庫本對讀，就更可看出滿淸政府删改史籍的陰謀。又如「四部叢刊」續編裏面，也保存着滿淸政府删改中國史籍的痕跡。宋洪邁的「容齋隨筆至五筆」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據張元濟跋，其中有三條就爲淸代刻本中所沒有。所删的是怎樣內容的文章呢？爲節省紙墨計，現在只摘錄一條「容齋三筆」卷三裏的「北狄俘虜之苦」在這裏：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分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王子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卽無一

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耕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實火得暖氣，燃纔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取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

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說到滿清删改歷史時，曾經慨然地說：「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個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淸歷史的關係，都通通删去，所有關係記載滿洲、匈奴、韃靼的書，一概定爲禁書，通通把它消滅，不准人藏，不准人看。」淸朝不但自掩其凶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凶殘。如果史家不察，貿然根據淸朝所删改過的史籍來編著歷史，豈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世有史家，或爲威脅，或爲利誘，或因有別種目的，本無意於作信史，如此之流，我們暫且不去管他。即有誠意作信史之人，他所寫的歷史，偶有根據不實，也就難與歷

史之實際，完全符合。何況中國過去史籍，大部都是帝王家譜，寫歷史的人，大多是帝王御用的史官，囿於他們的階級意識，即使秉筆直書，也會歪曲了眞正的事實。唐朝史家劉知幾，就曾有過這樣痛苦的經驗，他在「史通自序」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既朝廷有知音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爲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志，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指中宗）卽位，又勅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嘗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惟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爲史官所嫉。嗟呼！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

劉知幾三任史官，因與監修貴臣「鑿柄相違，齟齬難入」，雖多方遷就，「猶大爲

史官所嫉」，有「吾道不行」之歎，不得已乃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志。現在我們把他私撰的「史通」加以客觀研究，雖覺不無可取之處，尤其他對於史籍的辨僞精神，値得我們敬佩；他所提出「良史必須善惡皆書，使驕君賊臣知所懼」的觀點，亦爲不刊之論。但在基本觀點上，劉知幾在「史通」裏所表現的精神，依然不出玄學史觀與儒家道統的範圍，依然沒有把中國歷史看成人民的歷史。這裏面的原因，我們不難在他的社會基礎中求得解答。爲使我這個推論求得確證起見，最好再看劉知幾在「史通自序」中的自白：

「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迄於周，其文不刊，爲後世法。自茲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傳也，嘗欲自班馬以降，訖於姚（思廉）、李（百藥）、令狐（德芬）、顏（師古）、孔（穎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普加釐革。但

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誚末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囘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敢也。」

劉知幾自信有秉筆直書的史才，然而囿於當時的歷史環境和他自己的社會意識，終於「握管嘆息」，不能有比「史通」更高的成就，這也可以證明究竟是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雖然意識也會影響於存在。

四　建設信史的前提

中國原有史籍既然包含了許多偽造成份，復經過歷代統治者的武斷刪改，其眞實性自十分微弱。我們希望出現一部新的中國通史，中國思想史，中國經濟史，及藝術各部門、文化各部門的專史，就是史綱也好，但要貨眞價實的信史，亦即是科學的中國史。要實現這個希望，必須重新搜索史料，經過科學的整理和蘄革，對於偽造的歷史和被曲解的歷史，要重新給以評定，被歪曲的要加以矯正，被粉飾過的要把粉飾去掉；但用不

着矯枉過正，更用不着重新塗抹，而是要還元出對象的本來面目，這是翻案工作與建設信史的必要前提。然後儘可能據有各種史料，並運用科學的歷史方法，加以實事求是的研究，眞正的中國信史，才有出現的希望。

本來，無論作何種研究，材料的據有和檢討，都是必要的前提。研究歷史科學，自然不能例外。史料不夠或不能自由運用，固無從着手研究；有了史料，而不能加以科學的檢討，即對於史料眞僞和時代性，如不能檢討淸楚，也和缺乏史料一樣，甚至還更危險。因爲缺乏史料，至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史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爲有害。

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所最感困難的，是史料保存下來的太少，而僅有的一些史料，又都是眞僞難分，時代混沌，不能據以作爲科學研究的素材。說到文獻上的辨僞工作，自滿淸的乾嘉學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辯」派，雖然已有不少貢獻，但決不能說已經做到毫無問題的止境；反之，由於立場的局限和方法的幼稚，他們的成就還是有限，而時代性的研究，更差不多是到近二十年才開始。

例如「周易」這部書，據郭沫若先生最近的考證，是戰國初年楚人馯臂子弓所作（見郭著：「周易之制作時代」），但一向被認爲殷末周初的作品，即郭沫若以前寫「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時候，也是這樣認定，並把「周易」作爲研究殷末周初的史料，當然陷於錯誤，所以郭沫若先生近作「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就把這點糾正了。

又如「尚書」，我們早已知道有今古文之別，古文是晉人的僞作，但在今文的二十八篇裏面，也有眞有僞。其中「堯典」（包括古文「舜典」）、「皐陶謨」（包括古文「益稷」）、「禹貢」、「洪範」這幾篇很堂皇的文字，大概都是戰國時代的東西，郭沫若認爲當作於子思之徒。郭沫若自己批判說：『我在前雖不曾認「典謨」爲「虞書」，認「禹貢」爲「夏書」，以作爲研究虞夏的眞實史料，但我却把「洪範」認爲確是箕子所作的東西，曾據以探究過周初的思想，那也完全是錯誤。』

詩三百篇的時代性尤其混沌，詩之彙集成書，當在春秋末年或戰國初年，而各篇的時代性，除極小部分能確定者外，差不多都是很渺茫的。自來說詩的人，雖然對於各詩也每有年代檢定，特別如像傳世的「毛詩說」，但那些說法差不多全不可靠。例如「七

月流火」一詩，毛詩認爲意指「周公陳王業」，研究古詩的人大都相沿成說，但現在知道它是春秋後半期的作品。

靠着殷墟的發現，我們得到一大批研究殷代的第一手資料。就靠着這一發現，中國古代歷史的面目，才有具體認識的可能。卜辭的研究要感謝王國維，是他首先由卜辭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整理了出來，使「史記」「殷本紀」和「帝王世紀」等書所傳的殷代王統得到了物證，並且改正了它們的誤傳。如上甲之次爲匚乙、匚丙、匚丁，而非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本作示壬、示癸，中宗乃祖乙而非大戊，庚丁乃康丁之訛，大丁以文丁爲是，均抉發了三千年來所久被埋沒的祕密。因此，有人說殷墟的發現是新史學的開端，王國維的勞績是新史學的開山，那是不算過份的。

繼王國維之後，在這方面貢獻最多的，要推董作賓和郭沫若。董作賓和李濟從事殷墟的發掘，固然是不能磨滅的功績；而董作賓在卜辭研究上，能夠進到斷代研究的一步，更有輝煌的貢獻。卜辭是由武丁至殷末的遺物，綿延二百年左右，以前只能混沌地知道它是殷物，近年來主要就由於董氏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每一辭或每一甲骨是屬於

那一王的具體年代了。這樣便更增進了卜辭的史料價值，在卜辭本身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發展了。

郭沫若在這方面也盡了很大的努力，如王國維發現『先妣特祭』之例，足證殷代王室還相當重視母權。郭沫若則進一步發現了所特祭的先妣，是有父子相承的血統關係的，卽直系諸王的配偶雖被特祭，而兄終弟及的旁系諸王的配偶則不見祀典，這就可以證明立子立嫡之制，在殷代已有它的根蒂。

如上所舉，只是中國古代歷史幾項重要的發現，卜辭的研究，雖然由王國維開其端，但繼起的成績却比王氏有更大的進步。『卜辭的研究，是新興的一種學問，它是時常在變遷着的。以前不認識的事物，後來可以認識了，以前認錯了的後來改正了，我們要根據它作爲社會史料，就應該採取迎頭趕上的辦法，把它最前進的一線，作爲基點而再出發。』這是郭沫若所得到的研究心得，雖然郭氏的歷史觀點，有許多値得商榷之處，但無論如何，這心得總是値得歷史家深深記取的。

五　考證學和歷史

考證學，就其廣義來講，原是史料的檢討工作。歷史家對於考證學如能加以適當運用，使能在龐雜的史料中去僞存眞，撥其華袞，示人本相，對於建設信史，自有莫大裨益。然而在中國歷史考證學的陣地上，却存在着頑固的自封性，不是「守高曾之規矩，敝敝焉以此爲事」，就是沾沾於捨棄思想內容的字句鑽研，往往因追尋一字一句的解釋，長至數萬言，而實際內容則空無所有。他們自己稱此爲實學，實際乃是一種支離破碎之學，其結果是「繁稱雜引，遊衍而不得所歸」。這種考證學或稱純漢學，由顧亭林開其端，至戴東原而集其大成，到乾嘉時代崔東壁等，而達於鼎盛。但是我們必須知道，在由顧亭林到戴東原的初期階段，尙包含着經世致用及批判的戰鬥精神；而到乾嘉時代的後期階段，已完全成了古書字句的鑽研與考訂。

在考證學裏面，又有所謂正統派與雜流之分。正統派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相標榜，這可以引證王西莊「十七史商榷序」裏幾句話來說明：

「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獨處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言、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錄，以及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遺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蹟之實也。」

不能否認，在史料的整理排比上，他們是有相當貢獻的。古書眞僞難辨，經過他們的孜孜考證，雖所得結論不盡確當，究竟給了我們一些應用的方便。

所謂考證學的雜流，那是正統派給他們的徽號，因爲他們最喜『單文孤證』，又不免『妄生穿鑿』，爲後來『曲學阿世』開其先河。這裏，可舉錢大昕的話，作爲他們的寫照：

「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摘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訛。易斗分作升分，更日及爲白芨，乃出校書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爲大創，馳騁筆墨，夸曜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輒以褒貶自任。強作聰明，妄生瘢痏。不計年代，不揆時勢。強人以所難行，責人以所難受，陳義過高，居心過刻，予尤不敢效也。」（「二十二史考異記」）

前面說過，考證學到乾嘉後期已陷於支離瑣碎，甚至不惜「妄生穿鑿」。這時候，國際勢力打開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從此邊陲多事，一些帝國主義的學者，隨着殖民地拓展的興趣，而展開它們的發掘與研究工作，這趨勢刺激開拓了中國考證學的園地。於是俗流的曲學阿世之徒，也由「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一轉而入於政治性的依附。直到「五四」前後，由於民主與科學潮流的激盪，中國傳統的偶像開始崩潰。益以新興社會科學的介紹和研究，打開了考證學的枯寂園地，注入一些新鮮活力，因而對於整個的歷

史理解，也隨着歷史行程而有新的啓示。

平心而論，中國近數百年來的歷史考證學，確有相當成績，但它缺少了活的神經，以致成了一種跛行學問。我認爲考證學的新內容，應該注入必要的活的神經組織；這個活的神經，當然不是使那快入歷史博物館的儒家義理之學再投胎復活，而是應該汲取由近代新興科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綜合起來具有客觀眞理的科學歷史觀。歷史考證學如要開闢自己的偉大前途，就須要在這總神經系統上有所連屬，取得它自己的新發展基地，再不能單做材料的彙集、歸納、辯正，或根據之而穿鑿附會出一個預定的論據，任意作「模金御史」的曲說欺世。它需要從戴東原、錢大昕、王西莊、趙甌北、王國維諸先輩成功的基地上，注入科學歷史觀的新生命。

考證學應該用相互關聯的眼光去審察各種史料，因爲歷史的發展過程，是整個的有機的發展過程，不能單獨的孤立的去理解。譬如漢末魏晉南北朝時期頹廢派的生活態度：清談、玄學、隱逸、酒藥、書法、山水……等等，如果單獨的孤立的去考察，割裂它們之間的聯繫，便變成只看到歷史劇的一個場面，而不能了解全劇的結構。同時，考

證學吸收了科學歷史觀的新生命，還須要把人類社會發展階段，以及生產、生產諸關係及其時代性弄清楚。歷史有着它自己進展的程序，死拖住歷史的，將被歷史所遺棄；同樣，如果讓兩三千年前的人物懷了二十世紀的思想，也是一種時代錯誤。譬如我們看了寫廉頗與藺相如故事的皮簧劇：「將相和」，可以使人想及團結的重要，但那個時候只能有精誠團結的概念，還不會有聯合戰線或統一戰線的說法。戰國時代可以有『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見「戰國策」）的事，梁紅玉可以擊鼓助陣大戰金山。但前者只能意味着將帥體貼士卒，後者只能解釋成少數傑出女性的英勇行爲，這與普遍的女性覺醒，抗戰無分男女，並不相同。女性的覺醒，在中國，乃是五四運動以後，民主革命的產物。戰國時代的女性，也許會感到一種被君王玩弄的不幸，可是如果說她們在那時就已提出『把我當成人』的要求，則未免太早了一點。我當然不能說古時候的人就根本沒有這麼想過，而成爲一種意識目的性的見解，當是整個社會進步了以後的事情。又如中國文學的發展，曾不斷的大量吸收土語白話，原是自然發生的現象，五四運動才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張起文學革命的旗幟。可是有人竟指二千年前的文學家就自己述說了吸收土語白話

的重要性，而且還教導學生有擺脫傳統文學枷鎖的必要，這也未免太先知先覺了。所以借他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的辦法，同樣有歪曲歷史眞實的危險。

另外有些考證學家，則以篤古的殘餘觀念，用格義比附的方式，在典章制度及一切文物上強調若干點的特異形式，或偶發的形式，類比目前的新事物。例如錢穆教授等把中國封建時代御史制度與宰相制度，了解成爲「中國式的民主」，甚至說是「最好的民主」，藉以抵制目前普遍高漲的人民民主運動。同時也有人說王陽明的十家牌法，元代的鄉社，王安石的保甲法，隋唐的鄰甲，管子的軌里連鄉等，都與現代憲政市政相合；甚至還有人把現代科學如量子力學、波動力學、新量子力學、數理邏輯、辯證邏輯等，一股腦兒融解到全部的神祕術數材料中去，而一直上達周易的卦爻變化。古老的文化，正如古老的人，他的寶貴的鬥爭經驗沒有被攝取，却在他少年浪漫史上所紀錄的潛伏性的病毒裏面，用新方法把它一一培養滋長起來了。古老的文化，正如古老的人，有他的文化遺產，也有他的文化病毒。歷史考證學家不應該繼承歷史病毒，而應用新的血液注射衰老的歷史機體，作爲我們現代新活力的源泉。

要使歷史翻案工作眞能做到去僞存眞和變僞爲眞，發掘歷史眞僞，考證辨僞是不可缺少的一環。所以考證學在整個歷史科學中，乃是主力部隊之一，不應該讓它局限於舊的崗位，而應該移置在新的戰略據點上。對於研究歷史材料，沒有下過深切的工夫，往往容易根據抽象的理論，冰凍在許多符號公式上，拿它當作郵局的圖章，亂刻在史料上，結果只能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並不能具現眞實的歷史。歷史究竟是整體的具體的，而且具有客觀規律和客觀眞理。中國舊有那種支離破碎的考證學，固然不能發現歷史的全貌，然而信史的建設，也究竟不能缺少校刊考證。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在如何充實和改造考證學，使考證學接受新的理論科學的指示，並使之成爲歷史科學有機的一部分。

六　立場和方法

但是，有了史料，辨明了史料的眞相，還需要有進步的立場與正確的思想方法，否則還是不能產生信史。因而，考證學也祇是歷史科學重要的一環，祇有考證的成果，還

不一定就能建設起眞正的信史。這裏，歷史家的社會立場與理論武器，有着決定和重大的意義。這就是說，要建設眞正的信史，或將過去統治者及其御用史家所僞造或被删改歪曲的歷史，給以正確的翻案，使之去僞存眞和變僞爲眞，有了考證學的豐富成果，還必須要有進步的立場和正確的思想方法，才能把握歷史之主流及其相互之關係，才能適當運用考證之成果，而使之有助於信史之建設。

我們知道過去了的整個宇宙的客觀存在，就是整個宇宙歷史的本身；過去了的人類社會的客觀存在，就是人類歷史的本身。所以人類歷史，應以人類本身的存在爲首要條件。而人類是什麽呢？人類是宇宙的一部分，是生物的一支派，但却不是單純的生物或自然物，亦即不僅僅受自然法則支配的自然物。「人是他們自己的戲劇的創作者兼表演者，人是被動的環境中唯一能夠自動的因子，人是歷史上唯一能夠自動且有覺悟性的力量。」所以人類是社會的動物，同時又是創造社會的動物；人類是歷史的產物，同時又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有人說：『我們人類是歷史之舟的搭客，同時又是它的划槳人。』但人類決不能主觀的憑自己一相情願的意欲去創造歷史，人只能循着社會發展的一定規

律去創造歷史。

歷史規律告訴我們：自從人類分成各種不同的階級或階層以後，任何一個人，不管他自覺或不自覺，都必然屬於一定的社會階級；雖然在某種條件之下，也有游離的個人，或不屬於兩大對立階級之中間份子，然而歸根說來，這種中間份子仍或隱或現的有它底階級屬性。所謂超階級的人，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天眞的虛構，在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在階級社會裏面，只有階級性的科學，歷史學也不能例外。一般的說，不同階級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意識。住在茅草房裏的人，和住在洋房裏的人，對於同樣的問題，往往有不同的想法。對現實問題是如此，對歷史問題也是如此。同樣一個秦始皇，民主主義者視之爲專制暴君，專制主義者則尊之爲中國大一統的英雄；同樣的宰相制度與御史制度，廣大人民視之爲封建君主的幫兇或幫閒，而錢穆教授之流，則把它當成「中國式的民主」來膜拜。當然，秦始皇畢竟是專制暴君，宰相制度與御史制度畢竟是中國封建時代統治機構的一部分，任你如何辯護和美化，也決不能改革它本身奴役人民的本質；但要淸楚認識這一本質，就必須要有進步的人民的立場。尤其是有許多史料，它的

客觀眞理性，不會像秦始皇與宰相制度御史制度這樣的明顯，而往往含有隱藏或經過塗飾裝扮的過程，這就更需要有深切與堅定的人民的立場，才不會受騙或被蒙蔽。現在我們所最需要的對於中國歷史中某些部分的翻案，就是要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把許多被歪曲的歷史加以辯正，恢復歷史事象的眞面目，把歷史從帝王、貴族、軍閥、地主、法西斯蒂等喝血者蹂躪之下解放出來，使它成爲廣大人民的歷史。

如果不是這樣，即翻案者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場，而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場，那就不能把錯誤翻到正確，反而會把正確翻到錯誤。例如錢穆在他所著「國史大綱」與「文化與教育」兩書中，就做了許多絕對荒謬的事情。他說：「我常聽人說，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的政體，是一個君主專制黑暗的政體，這明明是一句歷史的敍述，但却絕不是歷史的眞象，中國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說是君主一統的政府，却絕不是一個君主專制的政府。」像這樣顚倒是非的翻案文章，並不是錢穆一個人獨倡的。近幾年來，所謂學者教授中已有很多人（如張其昀、薩孟武等）紛紛著論，從各個方面來企圖證明中國秦漢以來的政治並非專制政治。很顯然的，這種看法倒還不只是學術研究上的一種「新」見

解，而且是和現實政治中的法西斯要求相呼應的，但爲了現實政治的反動企圖來歪曲歷史的眞象，那却是從根本上喪失了科學歷史的態度和精神。

又如推翻了一個封建的專制王朝，使億兆生民開始從專制壓制下蘇醒過來，站立起來的辛亥革命，而在馮友蘭看來，其意義却只是使中國的進步多了一番遲滯，是破壞了國家的組織中心！馮友蘭在其所著「新事論」中評論辛亥革命說：「中國的辛亥革命是以種族革命始，而以政治革命終。我們在現在平心而論，淸末當局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行底政策，並不能說是全盤底不對。若果沒有所謂滿漢種族問題，如果當時底皇室是姓劉底，姓李底，姓趙底，或姓朱底，辛亥革命可以沒有，國家的組織中心不致崩壞，則中國的進步卽可少一番遲滯。」很顯然的，馮友蘭對辛亥革命的這種翻案，決不是由錯誤翻到正確，而恰恰是由正確翻到錯誤，而其根原，也需要從馮友蘭的社會立場與思想方法去追尋。

復次，所謂歷史科學，是以歷史或歷史本身爲具體的對象而研究它，亦卽以人類社會過去了的客觀存在——一定的社會形態爲具體的對象而研究它。歷史或歷史本身，是

有其一定的發展變化的普遍的特殊的規律的，是卽歷史的發展規律。儘管歷史是那樣錯綜複雜，變動不居，但我們如能運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還是可以研究出歷史內在的發展規律來。待到研究有了結果以後，卽在我們探究出了歷史的內在發展規律以後，於是本來是不依賴我們主觀意識而獨立存在的客觀存在，亦卽歷史本身，便成爲我們主觀意識所能把握的東西，並能對它用語言或文字來加以敍述或記載了。但是這裏所謂敍述或記載，不是普通的記賬式的敍述或記載，也不是只注重語言文字本身的粗淺邏輯爲滿足；而是要把客觀存在的歷史本身，按照研究所得的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去敍述或記載。

我們還應知道：人類歷史客觀存在的本身，是具有着何等活潑豐富的內容，是具有着何等驚天動地的變革；不僅如此，歷史本身還具有着自己運動的巨大力量，以及普遍的和特殊的內在規律，而形成它自己運動的對立而又統一的完整體。我們在敍述或記載的過程中，都要如實地把它反映出來，再現出來，還它一個本來面目。這也就是說，對於歷史的經濟過程、政治過程、精神意識過程，以及經濟、政治、意識等等之間的相互

關係，與其支配歷史總過程的規律及其動力，乃至對於人物的描寫，英雄豪傑，社會制度等等對於歷史運動所起的作用，都忠實的謹愼的是什麼就還它一個什麼，絲毫不雜以主觀的好惡和成見。因爲只有如此，才不致失掉歷史本身的眞實性，才能把歷史本身經過我們的語言文字再現出來。歷史記載愈接近歷史本身，就愈接近歷史科學。因此，我們所說歷史翻案工作的另一意義，就是要運用科學的思想方法，把古今史家由於方法錯誤而把歷史歪曲的現象加以糾正，以便人們能夠眞實地把握歷史規律，來對歷史進行改造和創造。

研究任何一種學問或問題，我們都必須站穩立場，弄清觀點和方法，這三者之間不許孤立和對立，應使其密切聯繫而成一整體。我們進行翻案的目的，既然是在把非科學的中國史變成科學的中國史，所以我們進行翻案工作的時候，就必須實事求是，而不許自以爲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各種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在發展規律，「求」就是我們去追求和研究。因此我們在研究過程中，首先必須搜集一切有關的歷史材料與現實材料，再從具體的事物的全面形態中，歸納有關的具體事物，加以精密的分

析，考察並求得它們在發展中相互關聯的樞紐。接着再把其中所存在着的必然的現象與偶然的現象分別淸楚，又把主要的現象與次要的現象分別淸楚，不要把偶然的現象當作必然的現象來處理，也不要把次要的現象當作主要的現象來處理。因爲科學研究的任務，不僅要探究出客觀事物發展形態的內部關係，以及它們爲什麼表現爲這樣的發展形態，而且要把握歷史的主流與決定的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按照對象自身所具有的發展規律，一一安置於適當的地方，並從此得出應有的客觀結論。

如果不是這樣，而是憑空假想，從「想當然」出發，或預先有個結論，運用材料的時候，只選擇有利於自己預定結論的部分，對於不利於自己預定結論的部分，那怕是很重要的材料，也棄而不顧；再不然，就是以出奇制勝，一味憑自己的「天才」去解釋材料，而不去探求這種種形態的內部關係，也不問這種發展形態的主要作用究竟何在；這樣一來，不但錯誤的結論無力把它翻案到正確，反有把正確的結論翻成錯誤的危險。例如郭沫若先生研究了西周的社會狀況，發現那時尙有奴隸與奴隸生產的存在，並發現那時候，奴隸不僅可以授與，而且可以買賣；同時又認那時候所實行的井田制，也是一種

奴隸生產的形式；更認定左傳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這一事例，可以作爲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移的標幟，即在魯宣公十五年以前完全是奴隸生產，所以根本談不到賦稅，而魯宣公十五年以後，已開始出現了封建制，土地已經變成私有，所以才有『初稅畝』的記載。郭沫若先生根據這些理由，斷定中國在西周時代還是奴隸社會。（見郭氏所著「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與「屈原研究」等作品）

其實，社會歷史的科學知識告訴我們：祇有奴隸與奴隸生產的存在，並不能作爲奴隸社會的根據，主要還要看這種奴隸與奴隸生產在那個社會中究竟處於怎樣的地位：是殘餘形態呢，還是決定形態？根據已有的史料來研究，周革殷命，確實表示是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移，西周時代生產關係底基礎，已經是封建主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不完全的私有制，這種生產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經不能隨便屠殺，但可以買賣的農奴。西周社會，雖然還有使用奴隸的事實存在，然在生產領域裏，奴隸經濟已退出支配的地位，而向着農奴經濟讓渡。所以在西周，奴隸之被使用這一事實，那不過是前代所遺留的殘餘，而且這種殘餘的東西，往往通過了所有階級制度的社

會，而有或多或少的保留。何況買賣奴隸的事實，並不能作爲奴隸社會的根本特徵，這在封建社會裏也是存在着的。買賣人口的事實，現在中國有許多地方，還不是很通行嗎？至於說到井田制，如果在西周時代果眞存在過的話，那也正是中國封建初期力役地租的具體形態，即孟子所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其實爲封建主之私有），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謂『同養公田』，實際就是農奴對於封建主以力役當作地租來供奉，而且必須先把封建主的田地耕種完畢，才能以餘力耕種自己一部分的私田。從這一點，也可看出『初稅畝』的眞正含義，可知所謂『初稅畝』乃係開始以畝賦稅的意思，並非魯宣公十五年以前無須納稅，這可能就是由力役地租向實物地租的過渡，而力役地租，實物地租與貨幣地租，只是地租形態的不同，並不引起地租本身之根本變化。事實上，中國在周初，已有鐵器的發現，如果我們再從金文中之賜土地與連同土地附庸的記載中，更可知道當時的財產關係，已經是封建的財產關係。

郭沫若先生最近在「十批判書」中，又大做翻案文章，特別攻擊墨家，而贊揚儒

家，因此有人說郭沫若成了抑懸揚儒論者。其論據旣甚牽強，而歷史意義也多被顚倒。郭先生是中國數一數二的歷史家，又是我所敬仰的革命戰士，但是他在歷史翻案工作中，常常以出奇制勝，而不以正確制勝，我却期期以爲不可。

七　正史和野史

在進行中國歷史的翻案工作時，除了端正自己的立場與思想方法以外，還應特別注意運用野史史料。因爲正像魯迅先生所說：「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就容易了然了：因爲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所謂正史者，就是經過歷代帝王的承認之一大套合法的官吏，而且自唐代以迄於清代，其間所成的正史，都是由帝王所欽命的史官編纂而成的。這種正史的來歷和根據，就是歷代王朝的實錄及帝王貴族的起居注。這種正史，在根本上已經受了史料的限制，

而行文着筆的時候，又要受着當時政治的限制。這種正史，當然沒有如實反映眞象的可能，而且不免歪曲和塗改事實，以適應當時統治者的要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明明是荒淫無恥的暴君，而在史書上却留下滿紙仁義道德的詔令。「史通」載文說：「歷代皇帝每發璽書，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敍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惟頑與暴，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可見正史上的詔令，大半不能信據。

又如正史上把歷代的太祖高皇帝都寫成神聖，不管他們在搶奪政權的過程中，做過多少殺人放火以及其他許多不可告人的事情，可是他們所御用的歷史家，總是說他們是救民水火或爲民請命。反之，被歷代統治者所判定的叛逆，不管他們在破壞舊社會制度與求解放的鬥爭中，得到過多少人民的擁護，但御用歷史家總要把他們描寫成野蠻成性。正史所以不足完全信據，又因正史所載大抵都是和當時政治舞台有直接關係的人物和事件，至於閭巷瑣聞，草野之士，則往往棄而不錄，實則此等被正史所屏棄的人物和事件，却往往是社會發展的脊梁。魯迅先生曾不只一次發過慨嘆：「我們從古以來，就

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救世的人，有爲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不過總被摧殘，被抹煞，消滅於黑暗之中，不能爲大家所知道罷了。」因此，爲了辨正及補充正史，我們必須進一步去從各時代的私人著作如野史、雜記、文集、詩詞，乃至小說與劇本中，去搜求正史上所沒有但却非常珍貴的史料。

野史之興，據國史「經籍志」云，是因爲「天子正官，或屈而阿世，貧而曲筆，虛美隱惡，失其常守，於是岩處奇士，偏部短記，隨時有作，冀以信已志而矯史官之失。」雜記之作，其動機與作用，亦與野史相同。所不同者，野史雖非一代之全書，但常具一事之本末；而雜記則隨其見聞之所及，拉雜成篇而已。惟不論野史或雜記，其眞實性都遠非正史所及。例如張鷟所著「朝野僉載」，就揭載了許多正史不敢說的話，尤其是對於武后一朝的「羅織經」，表示深惡痛絕。張鷟在「朝野僉載」中，以嫉惡如仇的心情，爲「羅織」者寫下血腥的罪惡；以憤激的情緒，寫出貪汚者的醜態；寫昏庸尸位，令人哭笑皆非；寫佞諂令人嘔吐，指破瘡疤，張張見血。加以這種野史雜記所載里巷細事，記錄民間見聞，亦較正史爲詳。例如宋史上記徽欽北狩，語焉不詳，但我們翻開

「南渡錄」一看，則對於徽欽北狩時所受的屈辱，幾乎逐日記載。又如明史上記明代與南洋的關係，甚爲模糊，而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槎勝覽」，顧岭的「海槎餘錄」，則對於明代時候的南洋風土人情，以及中國人在南洋的活動狀況，却寫得有聲有色。

至於說到私人文集詩詞，雖然不能算作史籍，但我們在私人文集詩詞裏面，却常常可以找到當時可貴的史實。而且一般說來，任何時代的詩文都是時代的呼聲，因而亦卽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反映，有時還能指出許多隱微的事跡，而有助於糾正流行的偏見。譬如寫岳飛的事跡罷，一般的寫法，不過是把岳飛的精忠報國與秦檜的通敵賣國對立起來，這種由普通演義所安排下來的公式，至今還沒有能夠打破。讓王氏用一杯毒酒親自害了岳飛父子，乃是一種「想當然耳」的手法，其實並沒有一定的根據。爲秦檜洗冤，固然多此一舉；但是滿足於淺見，亦決非科學精神的表現。我們如能較深的發掘下去，秦檜所以敢於假傳聖旨，發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飛，又不使他面聖，以莫須有三字構成冤獄，正還有一個始終被漏網的人物在支持秦檜，那就是南宋高宗。文徵明的「滿江紅

詞」，就道出了這一公案的內幕：「豈不念中原蹕，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旣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祇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如果現在有歷史家要這樣翻案，並不是爲秦檜洗冤，而是爲封建政治勾出眞正的臉譜：他們寧可使民衆受難，國家淪亡，也不肯放棄自己的九五之尊的。又如唐書中對於安史之亂，只說到怎樣討伐安史，但是我們讀了唐代詩人杜甫所作「石壕吏」的詩篇，我們却可進一步找到當時兵役制度與官吏虐待人民與虐待壯丁，而又可引證我們這次抗日戰爭中現實政治的可貴史跡。

小說與劇本雖係敍述里巷雜事與民間瑣聞，而且往往雜以神怪不經之談，但它所敍述的雜事瑣聞，正是作者當時所處的社會之眞實的形象，只要我們去掉其中所包含滑稽與歪曲的成分，卽可蒸溜出不少眞實的史料。因爲任何文藝作家不論他馳騁其冥想至如何虛幻的程度，他總不能飛到未來世界中去，當其構思涉筆，總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時代環境，因而不知不覺遂將當時的狀况描寫出來。梁啓超說：「「水滸傳」中魯智深醉打山門，固非事實也，然元明間犯罪之人，得一度牒，卽可以借佛門作逋逃藪，此却爲一

事實。「儒林外史」中胡屠戶奉承新聚人女婿，固非事實也，然明清間鄉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社會上特別階級，此却爲一事實。」又如元曲「竇娥冤」一劇，述竇天章借了蔡婆婆幾十兩銀子不能償還，便把女兒端雲送人抵賬。竇天章不一定實有其人，然而在元代以女兒抵賬，却爲事實。就是現在的中國，也還可以找到以女兒抵債的事實。「陳州糶米」一劇，描寫劉衙內的兒子小衙內和他妹夫楊金吾到陳州開倉糶米，他們把五兩一石的官價改爲十兩，用八斗小斗賣米，用加三大秤收銀子，並且還要在斗裏打雞窩，在米裏滲進泥土糠粃。劉小衙內和楊金吾，不一定實有其人，而元代糶米的官吏之私抬官價，大秤進銀，小斗出米，而且在米裏面添糠添土，則實有其事。諸如此類的例子，在小說劇本中觸目皆是，只要我們有工夫去搜尋，那在任何小說劇本中都可找到有用的史料。

經過野史雜記和文藝作品的參證，對於正史上的史料，自然可以獲得不少的補充和訂正；但我們却不能因此就完全相信野史雜記，因爲野史雜記和文藝作品，都夾雜着私人的情感。固然，私人爲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情感，那也是了解作者當時的社會之一種間

接的史料，但是在情感的衝動中，總難免沒有偏見夾雜其中，而這種偏見，就足以淆亂歷史的眞象。爲了使歷史更信實起見，我們必須再考信於實物。所謂實物者，即考古學家所發現的各時代的人們所手製的器物，如舊石器時代的打製石器和骨甲器物，新石器時代的陶器和黃銅器，殷周時代的甲骨文字及青銅器物，兩漢的鏡鑑、磚瓦及簡牘，南北朝及隋唐的佛像雕刻及寫經，宋代的瓷器以及元明清各代的遺物等。這些東西，可說都是沒有經過後人塗改的原封原樣的史料，因而這些實物也是比較眞確可靠的史料。我們用這些實物上的文字和花紋，再去把文獻上的史料加以考驗，那所得到的，便是最正確的史料了。

八　中國歷史性質的新認識

歷史是人類在其生活的社會中向前發展的生動過程，亦卽人類社會由低級形態進向高級形態之順次的更替過程。因此從其繼起性上看，這些歷史過程中的諸社會，都只是歷史發展總行程中的一個環節。但是從其特殊性上看，這些歷史過程中的諸社會，又決

不是歷史的碎片，而都是具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及照應於它的政治和意識諸形態之完整的有機體，都是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具體形態。

中國的舊歷史家，把全部中國史當作一個混沌的全體。他們以爲上下數千年，在中國史上，只有朝代的更替，而沒有社會經濟的變革。因而斷代爲史，成了中國史學界傳統的觀點，這樣一來，中國歷史，並沒有它自己運動的發展規律，而只是一些歷史碎片的堆積能了。對於這種傳統的錯誤觀點，我們必須給以糾正，才能復現中國歷史的生動的本來面目。我們以爲朝代的更替，只能指示統治者家系的轉換，並不能表徵出一定歷史階段上的社會性。因爲朝代的更替，不一定相應於社會經濟的變革，比如在中國史上，從周秦至雅片戰爭，朝代更替了幾十次，皇帝姓氏也不知換了多少，而社會經濟依然是封建主義的本質，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反之，同在一個淸朝，但在雅片戰爭以前和以後，却有封建社會與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不同，因而社會經濟形態以及意識形態，都已大大不同了。

到民國以後，中國資產階級學者因爲受了歐美資產階級歷史學的影響，於是在編著

歷史教科書的時候，又依據時代先後，把中國歷史劃分爲上古、中古與近世，這種劃分與斷代史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們把一系的朝代，歸納於古今的抽象概念之中。這樣一來，歷史的具體性喪失了，而只剩下一個抽象的時間概念。另外有些所謂歷史學者，則任意把中國歷史劃分爲神權時代、君權時代與民權時代，在表面看來，這種劃分，比之於上古、中古、近世等要具體一點，但在實際上，依然不能表徵歷史發展的時代性質，所以這種劃分，仍不脫主觀武斷，還談不上中國歷史的科學研究。眞正的科學歷史觀，必須根據人類社會生產與生產方法的變更，來區分歷史的社會性質，而根據這種方法來區分，那末中國歷史也和其他世界各國歷史一樣，只能區分爲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以及將來必然到來的社會主義制。

中國歷史有其悠久的發展過程，它是世界歷史構成中的一個主要部分，它和其他各民族的歷史一樣，有它自己發展的規律性，也有它和世界史相互滲透的辯證過程。因而我們決不應把它當作一個混沌的全體，也不應把它切成無數零碎的片斷，更不應把它當作一個孤立於世界史之外的單位。我們應該從中國歷史的本身，從中國歷史與其周圍鄰

近的民族的相互關係，乃至從它與世界歷史的統一過程中，從正面反面和側面去究明中國歷史自已運動及其發展的規律性，發現出構成其發展動力之主導的及從屬的諸契機，藉以窺探其現實的動向。於是魯迅先生所說：「歷史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的眞正內容，我們才有切實把握的可能。

關於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意識諸形態的發展，過去中國的歷史家已經注意到它們的重要性。比如各朝代歷史記錄中，都有關於經濟記載的專論，如食貨志鹽鐵志等。至於政治記載，則是全部古史的主要課題，如本紀、世家、列傳等。關於意識形態的記載，也有藝文志、文苑傳、釋老傳等。不過他們沒有從它相互關係上作統一的考察，而只是作孤立的敍述。因而他們的經濟紀載，便成了「流水賬簿」；政治分析，便成了「個人年譜」；而意識形態的傳達，則等於「圖書目錄」。難怪他們只知道經濟制度如何如何，而不知道爲什麼出現了這種經濟制度；只知道個人在歷史上的行動如何如何，而不知道爲什麼會有這樣的行動；只知道當時思想文化如何如何，而不知道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思想文化，以及這種思想文化產生之後，又怎樣影響於經濟政治。可是科學歷史的研究

任務，並不僅是知道「怎樣」，而且要知道「爲什麼會這樣」。

實在說來，在歷史發展階段上的任何社會，都是一個活的有機體，經濟是它的骨骼，而政治與意識諸形態，則是它的血肉。就中國的封建社會來說，在它特定的生產方式之內，還存在着它的生產諸關係的矛盾之社會的表現，存在着維持這種生產方式的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也存在着支持這種等級制度的儒家哲學。同時，又存在着使等級制度絕對化的多神教，以及由父子相承之封建財產關係而產生的家族關係——宗法制度。因此，在社會之每一步歷史發展中，都必然引起整個社會構成之變遷，或至少成爲整個社會構成之全面推進的契機。同樣，在它向着更高形態的社會的轉變中，也就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之全面的澈底的變革。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雖然可能而且簡直不免會有封建殘餘，但決不能有完整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政治體制，也不能有反映中世紀等級制度的思想文化和多神教。適應於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需要的，一般說來是民主政治，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文化，是商品拜物教。而在法西斯國家，則爲適應少數寡頭金融資本之掠奪需要，與企圖挽救革命危機，乃露骨乞靈於專制獨裁與對外侵略，在思想文化

上，則特別提倡所謂國家至上與集權主義，排斥自由思想與一切進步文化。從這裏，我們可以充分看出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之血肉相聯的依存性。

觀念論者把社會意識從社會存在中獨立出來，而且過分誇張觀念或意志的創造機能，認為社會歷史的發展，只是觀念或意志的獨立作用，與少數英雄豪傑之理想的實現。這樣，觀念或意志決定一切，經濟制度與政治因素都處於被動地位，歷史成了意志的屬物。這種反科學的歷史觀，當然不能說明客觀事物的眞實。須知科學的歷史觀，並不否認偉大人物的思想行動對歷史的重大作用，而且還承認他們對歷史的創造作用；但在究極上，總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而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存在。決定歷史發展之最基本的因素，乃是生產的諸關係，只有依據生產諸關係，才能規定一定的歷史階段上的社會之統一性和完整性，才能決定其全部政治思想機構的屬性，也才能規定個別歷史現象的聯系及其諸規律的特殊性。

機械論者則反是，他們把社會經濟諸關係從政治和意識中分離出來，而作孤立的說明。他們忽視政治與意識諸形態對歷史發展的反作用，因而作出了經濟決定論的機械觀

點。

我們以爲歷史的發展，在究極上，雖然是生產諸關係演着決定的作用，但相應於生產諸關係的政治和意識諸形態，在其自身的發展中，達到一定的程度，便能獲得相對的獨立性，並且積極地主動地反作用於其所依以建立的社會經濟之發展。不管這種反作用是幫助現社會的保存，抑或促成現社會的沒落，但在原則上，則是表現人類社會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辯證的發展。

過去以至現在，大多數的中國歷史家，都把中國歷史當作一種遺世而獨立的歷史；換句話說，就是把中國歷史當成與世絕緣的孤立的歷史單位，硬生生地割斷它與世界歷史的相互關聯。

但在實際上，當作一個獨立的歷史單位，中國歷史固然有它自己特殊的運動和發展；而當作世界史中的有機之一環，則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之間，又決不能劃出一條絕對的界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中，地理的疆域，決不能範圍歷史的衝決，因而中國歷史的變動，往往影響世界歷史的發展；反之，世界歷史發展之總的傾向，也必然制約着中

國歷史的發展。中國歷史之於世界，正猶細胞之於人體，它是一個個體，但它決不能離開人體而自由的發展其生命。所以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必須顧到它與世界史的關聯性。

中國歷史也和世界其他民族的歷史一樣，有它的一般規律性，同時也有它的特殊性。假如我們把任何一個方面抽引出來而加以誇張，那都會失去中國歷史之本來的面目，而得出不正確的結論來。

有許多人喜歡說，中國的國情不同。他們的意思是說，中國的歷史和別的國家的歷史完全不同，過去不同，現在不同，將來也不同。所以別的國家可以實行民主，中國却不能。他們把中國歷史描繪成爲一個神奇的東方之天國的圖畫，在這裏充滿了歷史的奇蹟與人類社會的神祕，一切都是特殊，中國歷史就是一個與衆不同的特殊體，因而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在中國完全不能適用，從而作出了中國歷史上不是缺了這個社會，便是短了那個社會之結論。像這樣的看法，如果不是出於某種企圖之有意的歪曲，那就是神經衰弱的歷史家之感官上的幻覺，與中國歷史之客觀的實在性完全不符。

另外有些歷史家，則強調中國歷史的一般性，他們不是用一般法則代替現實的中國

歷史，就是用一般法則硬套具有特殊性的中國歷史；結果，在一般法則之前，中國歷史變成了完全失去個性的東西，幾乎變成了西洋史的再版。他們不知道所謂一般法則，只能在大體上近似地不完全地把變動中的歷史現象反映出來，它並不能攝取現實歷史中之無限豐富的內容。在現實的歷史中，中國歷史的許多現象，決不能與西洋史完全沒有偏差，因而一般法則便不能一舉而完全無誤地把中國歷史發展的特殊性都反映出來。

考古學的報告和其他許多歷史資料指示我們：中國歷史也履行了世界歷史發展之一般的過程。許多舊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的發現，證實了中國曾經有過原始公社制的社會之存在。殷墟出土的青銅器文化和許多甲骨文字的記載，又證實了中國歷史中之殷代已經進入奴隸。根據若干可靠的古典文獻與金文的記載，中國從西周時起已開始進入封建社會。到清代中葉，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已經孕育出資本主義的因素，假如沒有雅片戰爭與太平天國的失敗，中國的歷史，也許早已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了。這就說明了：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法則，也同樣貫穿着中國的歷史。

雖然如此，中國歷史也有它特殊的地方。比如中國殷代的奴隸制，沒有發展到希臘

羅馬那樣典型的程度，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正是表徵中國奴隸制異於西方古典社會的特殊稱謂；又如中國的封建制，在秦朝就採取專制主義的形態，而這在西歐則是十五世紀以後的事情。因此，我們研究中國的歷史，其實當我們研究別國歷史的時候，也是一樣，都不應該強不同以爲同；但同時，也不應因爲形式上的不同，而遂懷疑歷史發展階段的本質。更具體的來說，就是我們不應該把殷代的奴隸制誇張得像希臘羅馬的古典社會一樣；反之，也不能因爲殷代的奴隸主每人平均沒有分配得十八個奴隸，而遂謂殷代不是奴隸社會。同樣，我們不應把秦代的封建專制主義與西歐十五世紀的封建專制主義相提並論，但也不應因爲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早期出現，而遂謂不符合一般法則。總之，我們應該承認中國歷史發展是遵循着世界歷史發展之一般法則，但同時，也切不可抹煞中國歷史自己所獨有的特殊性。

對於中國歷史被歪曲被塗改以至被僞造的部分，給以科學的翻案，使之符合於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把中國歷史被少數人佔有，並被蹂躪的狀況之下解放出來，使之變成科學的與人民大衆的歷史，實在是一件有很大意義的工作，同時也是一件異常繁重的工

作。筆者在這裏所提供的幾點意見，只是個人一點粗淺的心得，談不上有什麼重大的創獲，現在發表出來，不過是拋磚引玉，並供有志者參考而已。

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昆明被血洗第三日完稿於五華山麓

二　歷史爲什麼是科學和怎樣變成科學



一　什麼叫做科學？

要解答歷史爲什麼是科學的問題，先要明瞭什麼是科學。

簡括的說來，科學就是有系統的關於客觀現實事物的規律知識，以及實事求是，探求眞理，並勇於變革這客觀現實事物，以適應人類進步要求之方法的學問。因爲是關於客觀現實事物的知識，所以科學『不過就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而不需要任何外來的附加』（恩格斯）。這就是說，科學要求我們實事求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把握和認識事物，而不要有任何主觀的附會、曲解、誇大，或自以爲是。不消說，這所謂本來面目，就是物質。因爲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世界底情景，就是物質如何運動着和『物質如何思維着』的情景。物質、自然界、存在，

乃是在意識以外和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着的客觀現實；世界上的五光十色的現象，乃是運動着的物質底發展規律。世界是按物質運動規律而發展着，它並不需要任何物質以外的「宇宙精神」。

為什麼說世界在本質上是物質的呢？從現象上看來，世界上的事物是五光十色，複雜萬狀，並不僅只有物質的東西，而且也有精神的東西；但是從實質上看來，一切現象，都不外是物質運動的各種表現形式。客觀存在的物質世界，是唯一眞實的世界，所以說在本質上，世界是物質的。加以從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來說，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是被物質條件所決定的，是物質發展的反映。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就否認精神現象的存在，科學承認精神現象是眞實存在，而且承認精神對於物質也有極大的意義和作用，這叫做精神對於物質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在人類以外的動物界，已經有許多萌芽的表現，而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它的意義就表現得更大。人類社會生活之所以是目的性的意識的生活，就是由於人的生活是通過精神、意識活動的指導，是通過客觀事物的規律性認識的指導。人類就是依靠着那些精神

意識上的指導，才能改變自然，改變社會，才能對社會的物質生活發展過程給與積極的推動作用。

然而歸根結蒂說起來，我們總不能把精神現象看做物質之外獨立存在的東西，而只是物質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雖然精神和物質也有一定的分別，我們不能以爲人的腦髓產生意識，是和胃臟分泌胃液一樣的過程，不能把意識和胃液看做同樣的一種特殊物質；可是，不管怎樣，精神總不能離開物質而獨立存在，同時，精神也並不是在一切事物中都存在，而只是在高級有機物質中存在，低級物質雖然與周圍事物發生各種各樣的聯繫作用，然而不能算是精神作用。

物質內在運動的觀點，是理解一切自然和社會現象的關鍵。運動是物質的存在形式，是與物質的存在分不開的，什麽時候什麽地方有物質，也就一定有物質的運動。沒有運動的物質，是不能想像的，正如沒有物質的運動，也是不能想像的一樣。科學既然把事物看做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東西，而運動就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必然的表現。任何事物既然無時無刻不能不在一定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中存在，因此也就無時無刻不

能不在運動中存在。不能想像有孤立的事物，也不能想像有絕對靜止不變的事物。物體只有在運動中才能現出它的眞象，科學只有在物體的相互關係中、在運動中才能認識。科學對於運動之各種形態的認識，即是對於物體的認識；因此，研究運動之各種形態，便是科學的主要任務。

以科學的眼光來看，事物只在一定的發展條件之下，只在一定的聯繫中，才表現爲一定的運動形態；發展條件一經變化，性質形態也就跟着要起變化。因此，物質在發展過程中，在各種聯繫條件下，可以表現爲多種多樣的運動形態，這就叫做物質的多樣性。世界上五花十色的現象，不外就是物質的多樣性的表現，就是運動着的物質的各種形態。所謂物質的運動，不僅只是指機械的運動形態而言，而是指運動一般，即包含運動、變化、發展的一切形態，如化學變化、生物進化、社會發展等，都包含在內。

物質就是射着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引起感覺的東西，物質是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客觀現象。人類在自己的勞動和生活的實踐中，可以經常地和這個世界，和自然接觸着。我們人類在和自然接觸中得到各色各樣的感覺，並從這些感覺中形成我們的觀念，表象和

概念。在認識的繼續發展中，就由這些觀念、表象和概念，形成着各種各樣的科學觀點，以及或多或少的科學思想的體系。我們有了客觀世界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我們建立了關於自然及其規律的正確的、眞理底觀念，就能求得對自然的客觀眞理的認識，同時還有實踐給我們以可能來考查和檢驗我們認識的眞理性而拋棄謬誤。

不可知論底各色各樣的代表們，否認或者局限人類認識世界的可能性。譬如休謨就說：『我們的感覺完全不給我們以根據，去判斷客觀世界是否存在。』康德更公然斷言：『人在認識的過程中，就有關於自己的主觀的觀念，而世界底眞實的本質——「自在之物」，却是不能認識的。』實驗主義者則說：『眞理由人所創造，而人類意志是自由的，因此，所謂眞理的客觀性，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學說的提倡人之一，杜威，竟稱自己的宇宙觀爲『工具主義』。從杜威的觀點看來，科學的概念是人的實踐活動的有用工具，並且僅僅是這樣，它們是不能期望把握到客觀眞理的。

哲學史與科學史都給了我們以充分證明：任何主觀唯心論者都是否認客觀眞理的，

因爲從主觀唯心論者底觀點看來，人的認識不是以物質做基礎，不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是人的精神自由活動的產物。因此，人們關於這個世界的一切知識，亦是主觀的和相對的。照他們這種觀點推論下來，不可避免的要引到如下的結論，即一切認識的眞僞，都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個人的主觀認爲對的，就是眞理，各個人的主觀不同，則吾人的眞理也可以完全不同。例如巴克萊，阿文那留斯，馬赫和波格達諾夫等，就是這種否認客觀眞理的代表。

而其實這一切否認客觀眞理的主張都是錯誤的，因爲他們的想法都與客觀實際相背違；客觀實際經過科學研究之後，恰恰證明：物質的發展過程是可以認識的，因而世界及其發展規律也是可以認識的。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尚未認識之物，這些尚未認識之物，在人類智慧前進的條件下，也都有被科學和實踐力量所發掘和認識的可能。

恩格斯在批評康德及其他唯心論者關於世界不可認識和「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原理，而堅持關於我們的知識底確實性的科學著名原理時，寫道：

「把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遁辭，駁斥得最澈底的，就是實踐，就正是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夠以這樣的方法，來證明我們對於自然界某一現象的瞭解之正確，就是說，我們自己把它製造出來，依它的條件而把它產生出來，並強迫服務我們的目的；既然如此，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消滅了。在動植物身體上所形成的種種化學原素，當有機化學還未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曾仍然是這類的「自在之物」，而當有機化學已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為我之物了。例如拿亞里查林，即茜素顏料來說，我們現在並不是從那生於田野的茜草根上取得它，而是更便宜得多地，更簡單得多地，從煤焦油中取得它。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曾於三百年中被人視為假設，固然是很可信的假設，但終究是一種假設。可是，當列月爾略根據這太陽系學說底論據，不僅已證明一定有一個前此所未知的行星存在，而且已用計算方法確定它在天空中所佔的地位，後來，當加列果然已發現這個行星時，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就被證明了。」（引自「馬恩選集」第一卷第三三〇

頁）

列寧在責備波格達諾夫，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以及其他馬赫信徒爲崇神主義，而堅持唯物論底著名原理，認爲我們的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科學知識是確實的知識，認爲科學底定律乃是客觀的眞理時，說道：

「現代的崇神主義並不否認科學，它只是否認科學底「過分欲求」：掌握客觀眞理。既然有客觀眞理存在，既然只有在人類經驗中反映着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學，才能給我們以客觀眞理；那末，任何崇神主義就毫無條件地被推翻了。」（引自「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頁）

不過，人類認識底現實的生動的眞實的過程，並不是一下就達到客觀與絕對的眞理界限的。這是因爲認識是有條件的，在一定物質與精神條件下，我們對於獨立存在的客

觀事物，只能獲得某一方面的相當正確的認識，而不能一次就把客觀事物的一切方面認識透澈和完畢。何況在現實的認識過程中，除了主觀的障礙，如思想沒有弄通，因而不能認淸對象事物以外，還存在着另一困難，卽對象事物本身所含眞理的東西，常常是和虛僞的東西攙和在一起。人類認識底歷史過程，是經過相對眞理的總和走向絕對眞理的運動。這是經過從眞理和虛僞混和着的知識到日益淸除了謬誤的知識的運動，也是從不知到知的運動。「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安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攀登上不畏勞苦不畏險阻的人，才有希望攀登到光輝的頂點。」(馬克思語)在科學史上有無數事例顯示出，常常卽使後來被推翻的論點，亦表現着人類智慧滲透於客觀現實底祕密中去的過程，以及掌握客觀眞理的過程。試以解釋天河的構成的理論底歷史爲例：

統治於古代的關於天河的觀念大部分是神話的：一種說法，認爲天河是女神尤諾娜以牛奶洒在天空而成的；（所以天河的英文名詞是 Milky way，有人曾經直譯爲牛奶路，成了中國文壇上的笑話）另一種說法，認爲神法愛東所遭遇一種災禍底結果，我們中國也有所謂牛郎織女的神話傳說。最初的科學臆說之一，是說天河是太陽運動底舊軌

道的遺跡，太陽底運動，後來爲了某種原因改到黃道上去了。同時有一種說法，以爲天河是在比較狹隘的天空地帶中大量的星球底堆積，這是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里特的意見。這樣，關於自然的宗教神話觀念，和科學的臆說企圖給所見現象以客觀眞理的解釋底論點，在古代意識中鬥爭着。

到中世紀，有人把一切宇宙觀服從於地球中心說，把天河看做不是天文學上的現象，而是氣象學上的現象。祇有加里略復活了和確定了德謨克里特底天才推測：天河是星球底堆積。德謨克里特底臆說從這時起便成了科學的理論，雖然還不能說已經是天河研究底終結。後來，湯姆斯．拉依特在十八世紀提出了天河是臼形結構底學說，而威廉．黑爾施爾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底觀察，則一般地證實了拉依特的論點。接着，黑爾施爾用很大力量並很有耐性地研究天河底部分，結果又有新的發現，即天河中星球底位置不是對稱的，而是不平衡和散亂的。

黑爾施爾之後百餘年，齊里海爾和加激廾又創立了星球的世界底結構的新理論。這個理論的要點，是說太陽係處於天河的中心，而星球底堆積則愈離太陽就愈疏遠。這個

理論和黑爾施爾底理論有些不同，但是，不能否認，加潑升及其同志是根據黑爾施爾的研究成果而工作的。有趣的是，近年來的科學研究，指明了加潑升底天體模型的重大缺點。美國的天文學家沙潑爾經過觀測與研究之後得出結論說：『太陽並不在天河底中心，它離中心還有十萬光年的距離。』這迫得沙潑爾得出有兩條天河存在的推測：小銀河和大銀河。但是，就是這也還不是問題的最後解決，後代的天文學家將更致力於天河的研究，更加深刻地滲透其眞正的結果與其運動底規律。

不難明瞭：上述的天河論的每一個，並不消滅以前的理論，而是在辯證地攝取的形式中包括着以前的理論。現代天文學、天體物理學及星的統計，並不抹煞德謨克里特底天才的推測功勞。他底理論不是完全的謬誤，其中包含有正確的因子，有符合於客觀眞理的地方，在當時的條件之下，他底論據反映了客觀事物底現實狀況。以後的發現，並沒有推翻德謨克里特所說『天河是大量的星球堆積』的斷語，而祇是使它更確切化。可見人的認識雖然不能一次完全把握物質世界的全面的性質形態，但每一次的新發現，只要能夠正確地反映客觀世界的某些方面，把握了絕對眞理的一片，就都在絕對眞理的大

海裏增加了一粒。這一種無限的進步的可能性，就可說明科學有幫助人類認識絕對眞理的能力。

科學所以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就在於它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方法，就在於它能夠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把握和認識事物。譬如客觀事物是在相互聯繫中存在，科學也就從聯繫的觀點來研究事物。事物與事物之間的相互依賴與相互制約，既是這一事物的存在發展過程與另一事物現象的存在發展有分不開的關係，如果沒有一方面的存在和發展，則另一方面的存在和發展也就成爲不可能；那末，科學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從具體的各方面的聯繫上來研究事物，就是要找出這事物所由產生的各種條件，以及其他與它有關的一切重要條件，就是要依據這些條件來研究這事物的具體發生和發展的情形，這些條件怎樣爲事物所依賴，怎樣制約着它的發生和發展，就是要從歷史的發展的觀點上來研究事物。

其次，客觀是在運動發展中存在，因此，科學方法也就要從運動變化發展的觀點上來研究事物。這裏所謂運動，並不是單指機械的位置運動而言，而是指一切事物的各種

運動變化發展而言，即包括機械力學運動，物理與化學變化，生物的發展，社會的變革等運動在內。運動是普遍的，任何事物都是在運動中存在。事物是千種萬樣的，所以運動的形態也是千種萬樣的。科學的任務，就在於具體地分別研究事物的各種運動形態，不同的科學部門，研究不同的事物的運動形態及其規律。如恩格斯把世界一切事物的運動分爲五大類：機械的（位置移動），物理的（熱、光、聲、電等），化學的，有機體的，社會的。分別研究這些形態的科學，就是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社會科學等。

其次，事物的運動發展變化過程是由量變到質變，由低級到高級的昂漲運動。一事物的質對於另外的事物來說，就是它的基本的區別性，就事物的本身來說，就是它本身的規定性，就是使它成爲這一定的事物，而不成爲另外的事物的一定的規定性。事物的規定性，是在它的運動變化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事物不同，運動變化發展的基本的情況和傾向也就不同，例如中國革命本身有新民主主義的規定性，它與全世界的聯系及它自己本身的發展情況和傾向，都與舊民主主義不同。現實的事物，除了有它的一定的質

以外，同時還必然有一定的量，單只有質而沒有量的事物，在現實世界裏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不但要認識事物的質，也要認識事物的量，認識事物的大小多少等以及它的存在所佔據的空間時間的範圍，就是認識了事物的量的規定。現實世界的事物的量，都是具體的量，是與一定的質相結合的，抽象的量不會存在。無論何時，量總是以一定的質為基礎，具體的量是決定於質的規定。量變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引起質變，因為事物的各種因素的量的變化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引起相互關係的根本改變。質變之後，在新質的基礎上產生新的更高的量變，這叫做由質變到量變。量變是連續性的、或漸進的變化，質變是連續性的中斷，是飛躍式的突變，是革命式的變動。一定的質，和一定範圍的量變分不開，這就表示量和質決不是完全不相關的，而是統一的。這種統一，叫做質量。任何一種事物都有一定的質量，事物不同，質量也不同。研究事物，必須要認識它的質量。片面的單只認識質或只認識量，都是不夠的。認識質量，就認識了某一事物的一種必然的科學規律，也就是從數量上精密的認識了它的變化前途與界限，認識了它的突變點在那裏。

新事物的發生，由舊事物的發展所準備。兩者之間，有一定的關聯和繼承性。例如，幼蟲——蛹——蝶，種子——植物——花——果實，這一切雖都是質不相同的東西，却結合於發展的一個連鎖，而構成由低級到高級的昂澁運動。由舊社會到新社會的發展，也是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發展。

對立的統一的觀點，是科學用來研究事物發展的基本觀點。除非根本不承認科學，根本不承認事物的由量到質的運動變化，否則就不能一時一刻離開對立統一的觀點，就不能不在研究事物的時候，要分析事物本身的矛盾。因爲如果不分析事物的矛盾，甚至於不承認事物本身具有內在矛盾，那就不能把握到事物自己變化的根源，就不能明白運動變化的所以然，也就不能眞正理解運動和一切客觀事物。因爲一切事物都有着對立的方面，包含着與自己本身對立的東西，事物不僅是旣有的事物，而且包括着能推翻自己的現狀的因素。事物的現有的質都會漸漸成爲腐舊的要消滅的東西，而在它的內部同時生長着新鮮的向上發展的東西。『一切對象、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腐朽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這就是說，事物都有着自己的矛盾，都

在自己的內部包含着自己的反面和自己的將來，都是對立的統一。

所以，要眞正認識事物的質，就不能僅僅以它的正面的了解爲滿足，而且要認識它的反面，不僅要知道它現在的肯定的規定性是什麼，而且要知道它過去的質曾是什麼，將來的質會是什麼。要知道鷄蛋，必須知道它是鷄生的，並且將來也會孵化爲鷄；要知道新民主主義，必須知道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前身和它的社會主義的將來。

對立統一的觀點，不是空名詞，不是死公式，而只是我們具體研究事物的一般指導原則，應用的時候，必須注意到具體對象的具體的對立統一。對立的事物，只在一定的條件下才能成爲統一。每一事物都包含一定的對立性質和因素，如舊社會中有新社會的萌芽、因素，戰爭中包含革命，成功中包含犧牲等。但每一事物只包含它所能包含的一定的對立的方面，而不包括任何對立方面，如帝國主義戰爭只包含無產階級革命，決不包含資產階級革命，這就是一定的歷史條件所決定了的。

對立物不僅相互包含，而且互相依賴，即對立的一方面的存在，依賴於另一方面的存在，沒有後者，也沒有前者，因爲互相依賴，才能相互包容。但對立只在一定條件下互相

依賴，工人階級只在資產階級統治的社會條件下，才依賴資產階級（出賣勞動力）而生存，在工人階級統治的社會條件下就不是這樣；而且只在一方面相互依賴，決不是全面的依賴，工人階級只在必須出賣勞動力的情形下依賴資產階級，若要改善生活，以至於求得解放，那就只有依賴自已的力量與鬥爭；同時，在相互依賴中，也還存在着相互排斥的對立性，對立的鬥爭，並不會因相互依賴而停止，如革命依賴武力和戰爭，同時也就爲停止戰爭而鬥爭。

對立雙方也有相互制約的現象，即對立的雙方，在發展中相互限制，或是促進，或是阻礙對方的發展，或是對於對方的發展傾向和性質給以一定的影響，如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受了生產關係的限制，戰爭與革命相互促進等。但是從這種相互制約來說，也只在一定條件下，一方才能促進對方的發展，在另外的條件下，却可以有另外的情形。

不僅如此，對立雙方還可互相轉化，在一定條件下，同一事物會轉化爲自已的對立的方面，獲得了與過去完全相反的性質，這是因爲它的內部包含着的對立傾向，在一定條件下轉爲優勢的緣故，質變就是對立的轉化。但也只在一定的發展條件下才能互相轉

化，例如量變不到一定程度，不會引起質變。

科學既然承認對立統一的原則，就要把一切事物的變化運動看做發生、發展和沒落的過程，就要認清世界上的事物，決不會永遠只是這些事物；恰恰相反，整個世界內部不斷地有新的東西產生出來，也不斷地有舊的東西消滅下去。在這裏，任何偉大的東西，倘若它已經失去了向上發展的條件，倘若它已經是處在沒落的道路上了的話；那末，不管它眼前是表現得多麼聲勢顯赫，它終於是要沒落的。同樣的，任何微渺的東西，倘若它具備着向上生長的條件，倘若它是處在新生發展的道路上；那末，不管它怎樣微渺，它總是向前發展，它一定會有偉大的前途，它底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抵抗的，是不可被戰勝的。

所以，科學的使命，一方面要明瞭已經規定出的科學的傳統的力量和意義，善於爲科學的利益而利用這些傳統；另一方面，却又不要做這些傳統底奴隸。這科學當舊的傳統標準與規定成爲陳舊的，變爲前進運動的阻礙時，就要有勇氣有決心來破除這些傳統，同時又能夠創造新的傳統和新的標準。科學不能『聽天由命』，不能『聽其自流』。

它要用戰鬥來爭取產生與發展要得的東西底條件的生長與強大，促成那支持要不得的東西底條件的衰亡。科學是要求進步的，研究科學的人，經常在研究新發明，向舊的革命，在和支持舊的東西的力量作鬥爭，在和障礙新的東西生長與發展的力量作鬥爭，其目的是爭取新的適應人類前進要求的東西及早產生。例如原子彈是科學的發明，是人類文明史上一個偉大的成就，它劃分了時代，舊的時代死去了，一個嶄新的新時代正在開始，它一旦被應用在工業上，社會生產力將有不能想像的提高，然而美帝國主義者却不肯公開原子彈生產的秘密，企圖把它當成政治資本，藉以恐嚇蘇聯與全世界人民。然而，古往今來，沒有一種科學的發明，是可以始終保守秘密的，除非科學與人類根本被毀滅。蘇聯領袖已經向科學家工程師們提出：『我們也要有原子能，』這一要求不久就可在蘇聯實現。這一關於原子彈問題的進步與反動的鬥爭，有着很大的社會意義。一句話說完，科學所以被稱爲科學，是因爲它不承認任何偶像，是因爲它不僅能夠掌握有系統的，關於客觀現實事物的規律知識，而且能夠實事求是，探求眞理，並在必要時變革這客觀現實事物以適應人類的進步要求。

二 爲什麼歷史是科學？

科學的要義既已明瞭，我們就可進一步來解決爲什麼歷史是科學的問題。科學已經告訴我們：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乃是具有客觀眞理意義的確實知識。現在要回答爲什麼歷史是科學的問題，首先就應該問問社會生活與社會發展，是否也同樣是可以認識的呢？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據，是否也是具有客觀眞理意義的確實論據呢？而且我們知道，社會生活中的現象是比自然現象更複雜得無數萬倍的，科學是否也能夠完全把握到它的發展規律，並利用來作爲我們前進的指針呢？

要正確地解答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消滅唯心論者所造成的自然和社會底分裂狀態。他們把自然和社會看作兩個各自獨立的事物，以爲人類不是歷史的自然現象，人類自身並沒有自然的歷史。同時也需要消滅過去那種自然主義地觀察人類社會，即把社會跟自然界，跟物理現象及生物現象同等觀察的辦法。就是說，我們一方面必須明瞭自然和社會底統一性，同時又必須正確地估量到社會生活底一切特殊性和它底有別於自然界的發

展規律。

社會學上的自然主義及機械論，把社會與自然看做抽象的同一的東西。它們把社會看做機械的集合體，看做生物的有機體，看做物理學的、生物學的個人之總體。它們把社會生活看做生物學底特殊的領域，看做一切動物中所固有的社會本能之特殊的表現。因此，它們把社會的規律看做生物界的規律，把社會學看做複雜的生物學的規律之體系。而社會學上的唯心論，則在社會與自然之間，劃分一絕對的鴻溝，使社會與自然完全分離，而把社會生活看做與有機的自然界絕對無緣的某種心理的東西。心理界與自然界截然有別，所以社會生活與社會現象，決不能用自然科學所使用的一般概念去認識它。依據這種理論，社會現象是沒有原因的，卽是說，社會現象不受任何規律所支配，人們只能從所謂「目的」或「道德」的見地去考察社會現象，才能在社會現象中決定它的路向，所以照這種見解說來，社會學就是社會心理學或心理學的特殊部門。

但是客觀事實告訴我們：社會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在有機體的發展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所以社會決不能離開自然；同時，人羣底社會生活中存在着一種特殊的質地，這種

質地是不能用物理學、生理學、生物學等等自然科學底概念去認識它的。社會的人與生物學上的人不同，社會和有機體的總體不同。跟人類存在之自然的方面比較起來，社會是一種新的東西。社會生活，只有通過特殊的社會的聯結和規律性，才能認識它。而這樣的聯結和規律性，乃是社會所固有的，是和外界自然不相同的社會底特殊性。不過社會的歷史的生活之特殊的關聯和規律，是存在於它跟自然界底總規律相一致之基礎上，它們和這個總規律並不是絕對相分裂的，這就建立了自然和社會之辯證的統一。

在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底種種聯系及交互作用中，以及不斷轉變和不斷生滅的過程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必然的客觀的規律。例如波德底法則，說明了天體運行的規律；梅葉爾底能力不滅法則，說明了各種物理的、化學的能力相互轉化的規律；達爾文底進化論，說明了生物界的進化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底歷史唯物論，則說明了社會界的發展的規律。各種特殊的現象形態，就有各種特殊的發展規律。但是，如果把它們底特殊捨棄了，就可看出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的一致性。因爲一切現象都存在於不可分割的、相互聯系的、與相互依存的關係之中，一切現象都存在於永久運動的、不斷產生

與不斷消滅的過程之中。這種過程，是前進的運動，是向上昂漲線的運動，是從舊的質量狀態到新的質量狀態之轉變，是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並且這個過程，是在對象、現象所固有的矛盾的發展上，在根據於這些矛盾而動作的對立傾向之鬥爭上發生的。究明這種過程的辯證科學，就是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底共同的發展規律。

整個自然界底歷史，從星雲狀態算起，已不知有多少萬萬年；而社會界底歷史，從莫爾甘所說的蒙昧的時代算起，却不過幾十萬年。在無數萬萬年的自然史中間，由星雲而星球，由無生物而有生物，由單細胞生物阿米巴而進化到直立猿人，這中間也不知經過若干崎嶇的途徑，出現過多少驚人的偉蹟。一直到人類出現，製造了生產工具，從事於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結成了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這時，社會界的運動才開始產生。因此，社會不是與自然無緣的，社會乃是由自然的無機界經過有機界經過人類的勞動而達到的一個最高級的物質運動形態。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些運動形態的關聯，那就可以看出如下的系列：

甲、自然界底運動形態：

(一)機械的——(物體底移動、轉動與振動)。

(二)物理的——聲(發音體底振動與傳音媒介質底波動)；

熱(分子底運動)；

光(光子——或名光量子——底運動)；

電(電子底運動)。

(三)化學的——(原子中的最外層的電子底運動)。

(四)生命的——(原形質底運動)。

生物界中產生了人類，人類在生產勞動的過程中，創造了社會——

乙、社會界底運動形態：

(一)經濟的——(社會底眞實的基礎)。

(二)政治的——(政治、法律的上層建築)。

(三)精神的——(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

但是，社會的出現，並不是自然史的終結，相反的，自然產生了人類，產生了思維

與意識，自然才開始自己認識了自己，於是自然開始在社會的影響下繼續發展。

這種由自然到社會底歷史的發展，反映在科學領域中，就表現爲科學本身底歷史的發展：最早產生的科學是天文學及其有關的數學，力學；其後是物理學，化學；再後就是生物學等等。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科學的三大發見：能力轉化法則，細胞和進化論。一方面使自然科學本身不自覺地走向辯證法的時期，即自然科學史的第二時期；另一方面，也是辯證法唯物論底產生的條件之一，從此，馬克思，恩格斯才創造了歷史唯物論，使社會歷史的研究成爲科學。再者，社會科學的誕生，並不是自然科學的完成；相反地，一直到『社會現象的科學的說明，卽歷史唯物論產生之後，自然科學才開始理解了自己發展的眞正主動力和思維本身的辯證法』，才開始走向徹底科學化的過程。

上面是從縱的系列來說明自然界與社會界的依存關係，現在我們再從橫的關係來研究。這裏有一個顯著的現象，我們必須加以考察，那就是自然可以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社會却不能離開自然而存在於虛無飄渺之中。社會只有在自然中，並且只有在跟自然發生一定的依存關係中才能存在。兩者底依存關係，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是人類自身

底自然性質和社會性質底關聯，另方面是外部存在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關聯。

人類本身是自然底產物，又是組成社會的細胞。在解剖學上看起來，人類的生理器官的自然機構，和其他高等動物並無根本的差異，但是因爲人類是社會的動物，所以他的生理器官的進化，心理作用的發生，又有其社會的根源，並且社會發展，社會環境對於人類生理狀態的影響也就愈大。這就使某些人類爲研究對象的科學，如人類學，心理學等，成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中間科學，人類生理的心理的演變，就必須以自然和社會的各種法則去說明(社會法則，尤其重要)。這又使某種自然科學如生理學等，應該研究社會環境對於人體底生理的、精神的影響。並使某些社會科學如教育學等，應該與生理學、解剖學、心理學等相關聯，應該知道內分泌器官、大腦半球的作用以及兒童心理等等。

至於外部自然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則主要的有兩部類：「第一部類，是生活資料的自然的富源，如豐饒的土地與富於魚類的河川湖沼等；另一部類，是勞動工具的自然的富源，如奔流的瀑布，能航行的河川，以及森林，石炭與金屬等等。在文化的初

期，決定問題的是第一部類，但是在較發達的文化階段，決定問題的是第二部類」（資本論）。這就使研究社會歷史的人們，不能不注意當時的地理環境的影響，並且或多或少地應該知道一些自然科學的知識；這又使我們在研究生產力的發展時，應該懂得一些自然科學與技術知識。

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比較起來，前者是一種較高級的物質運動形態，高級運動形態雖然和低級運動形態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彼此仍有本質的差別，因此，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也就有本質的不同。

說明自然現象的法則，最基本的是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生命的運動法則，因爲一切自然現象的發生，都不外是以物體的機械運動，分子、原子、電子、光子等的物理運動，原子化合與分解的化學運動，以及原形質、細胞的生命運動爲基礎的；在這些基礎上，又發生天體運行、氣象變遷、地質演變、生物進化等複雜的現象，因此，要說明這一切現象的基本原因，必須求之於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

說明社會現象的法則，是社會歷史運動和發展的法則，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應該

求之於各時代的物質生產。因爲「生產及生產之後的產物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的社會形態中，生產品的分配以及與之相伴的社會階級或等級的劃分，是依靠如何生產，生產之後如何交換的情形來決定的。一切社會變革及政治革命的基本原因，應該求之於生產方式及交換方面的變更，應該求之於各該時代的經濟。」（見「從空想到科學」）

這一重要的區別，就使得社會歷史的研究，不能夠機械地搬運自然科學的法則。可是，在達爾文「進化論」問世以來，偏偏有不少學者如斯賓塞爾和李林弗德等主張用生物學的定律來解釋；在心理學發達以後，白芝浩和白克爾等又主張用心理學定律解釋社會。白克爾曾說：『拿心理學的鑰匙，來開人類行爲的啞謎。』其實，這是永久開不開的，因爲他沒有懂得自然法則與社會法則的差別，沒有認清自然與社會是兩個範疇。更沒有懂得研究特殊的規律，就必須用特殊的方法。研究自然現象的方法的最大的特徵，在於能作各種精密的實驗，例如阿基米德原理，吉呂薩克定律，光底折射定律，歐姆定律等，都可以用物理的方法實驗出來；各種化合物，可以用化學的方法製造出來；細胞底

構造，可以在顯微鏡下觀察出來；人體底構造，可以用解剖的方法研究出來。但是，研究社會歷史的方法，就不能這樣簡單，因爲社會法則是更高級的，更複雜的，所以就必須用更高級的更複雜的方法。這裏，首先就需要研究各個時代的生產方式及交換方式的變更，搜集、判斷、分析各種文字史料與實物史料，調查研究各種社會歷史的遺跡（如莫爾甘實地調查美洲社會以研究古代社會），深入到社會的各種活動中鬥爭中去從事於實踐，進摶歷史的核心，以探求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

可是，如果因爲社會歷史不能像物理、化學那樣做實驗，因而就否認它是科學；或者因爲社會歷史比自然現象要複雜得多，而且滲有人的意識作用在裏面，就否認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據具有客觀眞理的意義，那却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社會現象，也是在一定的聯系與運動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的必然的現象，而不是任何英雄豪傑的偶然願望所創造的現象。社會一切現象都決定於條件、地點和時間，所以必須依據這些條件來認識社會現象。這樣的觀點，就是歷史的觀點。

社會就是因生產而互相結合起來的一羣人底總體，社會所以發生及發展的出發點是

生產，生產就是人類藉生產工具之助，能動地加於自然的作用。社會現象和自然現象底統一是在社會勞動過程中實現出來的，這種過程就是人類全部歷史生活底基礎。「勞動首先是人類和自然間所進行的一種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類靠他自己的活動來決定，調節和統制他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他自己以自然力量底資格來同自然底物質相對立，爲要取得適合於他自己生活需要的一定形式的自然物質，他就把那屬於他自己的軀體，自然的力量、手和足、頭腦和四肢都動作起來。靠着這一種動作去影響外界的自然並改變着它，他同時也就改變了他自己的本性。」不過這種人類社會的歷史的生活之特殊的關聯與規律，是存在於它和自然界的總規律相一致的基礎上，它們和這個總規律並不是絕對相分裂的。同時人類底社會勞動雖是一個有意識的過程，也仍然有規律可循，因而也就適用科學原理，而且祇有應用辯證的科學原理，才能發現歷史發展的核心，求得正確的結論。

根據上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社會與自然的關係是辯證的統一。既然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既然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乃是具有客觀眞理的確實知識；那末，

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是可以認識的，而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據，就是具有客觀眞理意義的確實論據。因爲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之規律性的發展，所以社會歷史之研究也就變爲科學。

三　歷史怎樣變成科學？

歷史是發展之學，以研究物質及其他個別形態的客觀發展過程。因物質運動有各種各樣的形態，而有自然歷史和社會歷史的區別。『我們只知道一個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歷史能夠從兩方面去觀察，而區分爲自然歷史和人類（社會）歷史。但是，這兩方面是不能分離的，只要人類存在多少長久，自然歷史和人類（社會）歷史，都互相地制約着。』作爲社會發展學的人類歷史，是應當遠溯至太古，遠及於神話、寓言和牧歌時代的。但社會歷史之眞正達到科學階段，却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

在遠古時代，當人類開始知道應用象形文字的時代，他們就知道紀錄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的經驗。不過在這一時代，可以作爲歷史紀錄的材料，遺留下來的太少。人類的生

產力還很幼稚，因此人類對於自然的認識和克服，還是十分的無力和模糊，都是直覺的、主觀的、對於不認識的和不能克服的一切現象，便都認爲有一個超人的力量，即「神」在那裏主持着，支配着，這樣，他們對一切解釋不了的問題，便輕易的用主觀的幻想的方法得着解釋了。

後來，隨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已經有剩餘勞動給「治人者」去剝削，因此，人類較原來那種幼稚的素朴的認識力，在生產力發展的情形之下，有一步偉大的前進，於是局部的科學和形式邏輯，便具有初步的基礎。雖然他們對於歷史的說明，依然借助於上帝或神靈，不過這時和以前不同的，他們已具備一種較有系統的神學觀念，而把神學哲學化，成爲主觀唯心論。

中國的易經用卜決吉凶於神，是一種宗教，而卦爻辭却哲學化了。在歐洲從希臘羅馬時代一直到整個中世紀，在歷史學的領域內，都被神學所支配。最有名的，便是奧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他給與世界史的構成，便是所謂天命觀念的概念化。他認爲「世界上除了上帝之外，再沒有什麼實在的東西存在，除了上帝的啓示之外，再也沒有

什麼人類的現實歷史，」這便是奥古斯丁的基本命題。中國的甲骨文、「尙書」、「詩經」，以至後來的「國語」和「左傳」上，也充分地表現這種神學的歷史觀，如「天討有罪」，「天命殛之」，「天用勦絕其命」這一類的話，到處都是。孔子修春秋至「獲麟」即止，又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嘆，更是十足的天命史觀。

把歷史材料，加以系統的整理，以設定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最初嘗試者，在歐洲是由韋柯（Vico）開始的。他在他所著「關於諸國民之一般天性的新科學原理」一書中，由隱祕在人類天性中的內在諸因素來說明人類的發展。依韋柯說來，各民族的歷史和社會進化的規律大體一致，即一切民族都有同樣的進化，通過同樣的時代；並認爲運動是成爲一定循環的，而橫在歷史底根基之上的，則是人類的思想史。韋柯把人類在歷史上之發展的路程分爲神話時代，英雄時代及人類時代這三個階段。他所謂神話時代，即指人類發展之氏族時代；所謂英雄時代，即指人類發展之封建時代；而所謂人類時代，即指韋柯自己所生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時代。韋柯的歷史理論，就是完全適應當時最新登場的資產階級之需要的。

自革柯以來，在歷史學的領域內，便接連出現了許多互相分歧的思想。其中對於資產階級革命較有影響的社會歷史學說，首先就是社會契約說。社會契約說，以自然法學說為基礎。自然法學說，把人類的生活狀態分爲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在自然法學這種見解之中，又分成兩派主張。一派主張人類的自然狀態是鬥爭狀態，一派主張這是和平狀態。代表前一派主張的人是浩布思，代表後一派主張的人是盧梭。浩布思主張人類的自然狀態是萬人對於萬人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個人的本來的利己心大受損害，所以人們爲充分滿足自己的利己心起見，不能不放棄固有的權利，共訂契約，組織國家，以保障其利己的行動。浩布思的這種社會契約說，是代表資產階級借助絕對主義政權，以保障自己利益底主張的。至於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則主張自然狀態是平和狀態。人類之脫離平和的自然狀態而加入社會狀態，是私有財產發達的結果。他認爲自然狀態中自由平等的孤立的個人，雖是很幸福，而自然狀態下的孤立，對於各人的自我的保存甚不便利。爲要除去這種不便利，就要用共同的力量去克服而保障更進一步的自由和平等。這只有共同締結契約，加入於政治社會（國家）。所以社會契約的本質，就是『各人把自

己的身體和權利，放置在共同的最高的普遍意志支配之下，把自己看做全體的不可分的統一。」這種社會契約說，是以互相自由競爭而同時需要締結契約的「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者的關係」為指標的。這種社會契約說，對於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雖曾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但它的本身不是科學，因為它把社會看做互相獨立平等的原子的個人之機械的體系，又把社會的成立還元於互相平等的自然權的個人相互間的契約，是機械底，而且是虛構底。

和社會契約說同樣陷於機械，但却有別於社會契約說之虛構性質的，是採取科學外貌的地理史觀。地理史觀的要點，在古代和中世紀，已經有人倡導過，但對此提出較有系統見解的，要算是約翰布丹。布丹著有「歷史易知法」一書，詳細說明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的影響。他認為考察自然環境的第一個基礎，是地球的緯度；而緯度的差異，對於社會發生種種不同的影響，例如寒冷刺激人類，酷暑使人精神懦弱。布丹認為：由於溫度的差異，一般的北方人體軀偉大而有精力，但缺乏才智；南方人體格較小，有才智而缺乏精力；極北的矮小而耐寒；至於位居南北之間的中部民族，各與其幼年，中年及老

年之性質相適應。由於性質的不同，其統治國家的精神亦不同。北方民族依賴權力，南方民族依賴宗教，中部民族依賴正義與公平。南方民族富於神秘的冥想，北方民族擅長勞動與工藝，中部民族則調和兩者的長短，能爲其他民族制定法律與秩序。其次，布丹又用地球的經度，決定民族的特性。西方民族多具北方民族的性質，東方民族多具南方民族的性質。高山地方的居民性質酷似北方，溪谷地方的居民性質酷似南方。總而言之，由於地球的經緯度的不同，由於海洋、河川、氣候、土壤等等的不同，就產生出種種民族的特性、風俗、習尚、宗教、與社會制度，因而形成了各色各樣的社會。這種種意見，便是布丹的地理史觀的基本論點。

布丹以來，把自然環境的社會觀展開出來而比較具有一般性的學說，要算是孟德斯鳩所著「法意」一書了。孟德斯鳩說一切事物都有法，社會有法，國家也有法。『法，在最廣的意義上，是由事物的性質發生出來的必然關係。』『法，一般的在其支配世界一切人民的限度內，是人類的理性。而各國民的政法及市民法，只是這種人類理性被適用的特殊性。這些法，在各國人民說來，必須是固有的東西。』孟德斯鳩雖然力說國民

的法的特殊性，而同時又主張法的同一性。這同一性的前提，是廣義的自然環境、風俗及生活形式。因此，他展開了自然環境的社會觀，從各地民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的特殊性，說明這些民族的生活形式、國家形式、及其精神文化的特殊性，說明各地民族的生成及其歷史。

自然環境說的歷史觀的主要內容，無非是說明自然環境與社會制度的關係，而在社會以外的自然環境之中去探求社會發展的原因。這種歷史觀，流傳很久，影響也很大。法西斯主義者所倡導的大地政治學，在理論上有一部分卽脫胎於此。

科學告訴我們：人類自己變革自然，他們對於自然的關係，不是受動的關係，而是能動的關係。自然固是社會的必要的條件，社會沒有自然條件就不能生存。但是，問題的關鍵，却在於下述一點，卽自然與社會的聯系的性質，完全依存於社會本質的發展階段。而地理史觀則認爲社會發展的原因，不能在社會本身中去探求；因此，地理史觀也就是一種非科學的觀點，不管它採取怎樣的科學外貌，而在實質上還是非科學底。

我們自然不能否認，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生活，起着相當重要的作用。特別是

在社會發展的初期，當勞動工具還處在一種極可憐的狀態，而人類對於自然的影響力，還在極端微弱之時，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更大，例如古代人類對於氣候的依賴，就比我們現在要厲害得多。因爲這個緣故，古代人類的擇居範圍，就比現在遠爲狹隘；加以交通工具的缺乏，更極大地阻礙了人類相互間的聯系，使得好多地方都成爲閉關自守之域，而不能與其他地方發生關係。中國古書上有所謂「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記載，多少可以形容出上述情況。

同時，地理的條件，也影響了生產的性質。譬如，沿河一帶的居民，投身農作；草地上的居民，則務牧畜；森林地方，則作狩獵。五金的發現，使石器的勞動工具，可以進到鐵器的勞動工具。人類由狩獵進步到牧畜，當然也是因爲發現了某幾種的家畜動物。但這只是說明，地理環境的條件，是社會發展的一個經常必需的條件，而不是說它對於任何社會有決定的作用。在許多寒帶地方，從前因爲氣候條件的嚴寒，人類差不多是不能生存的，可是現在這些地方都成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區域了。在二百年以前，英國還是四分之三屬於農業，而現在則一變而爲完全的工業國，全國人民百分之九十是

城市居民。灌溉與肥料，使以前不能耕種的惡劣土地，現在也可以耕種了。

由此可知，地理環境是社會發展底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影響到社會之發展，因爲它可以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然而它的影響，並不是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反之，社會本身之變更和發展，是比地理環境之變更和發展，迅速得不可比較。在三千年中間，在歐洲，更換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社制、奴隸佔有制與封建制；而在歐洲東部，在蘇聯，甚至於更換了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境內的地理條件，或者是完全沒有變更，或者是變更得如此之小，甚至連地理學都值不得提及。這可以充分說明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不能有決定的作用。因爲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是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或一兩千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之發展的主要原因的。

其次，人性史觀、人種史觀與人口史觀，也都是在社會發展之外去探求社會發展之原因的錯誤的歷史觀。人性史觀可以法國孔德（Comte）爲代表，孔德認爲『社會的理性』乃是『個人的理性之大規模的複製』，因而個人的理性也就應該成爲解釋歷史的關鍵，

而他不知道從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之中去研究個人的本性，祇知從生理上去研究。他又規定「研究個人的本性的東西，是廣義的生理學，」並把所謂「社會物理學」作爲社會歷史學的基礎。因爲要作社會物理學之中去研究個人的本性，就不能不研究世代遞遭的影響。『一定的世代，影響於其次的世代，把前一世代傳承下來的以及本身所得的知識遺留於其次的世代。因而所謂社會物理學，就弄得要用知識及一般教化的發達的見地，去觀察人類的進化了。這是十八世紀純觀念論的見地，卽意見支配世界的見地。』

人種史觀由霍必諾所著「人種不平等論」所創設，後由法國人拉布烏知，德國人阿孟·渥德曼等所支持和修正，美國社會學者烏德也支持這種學說。這種學說認爲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必須承認是種族。他們在社會學的分析上，主要的是根據於各個人種自然特質（皮膚色顏、頭骨之構造等）的研究，然後才把這些特質聯系到社會的性質上去。他們把人種或民族當作歷史的根本要素，把人類或民族的鬥爭看做歷史進化的原動力。霍必諾把人類分爲黑色、黃色、白色三種。在這三種裏面，白色人種是文化的創造者，尤其是日爾曼民族與伊蘭民族最爲優秀，而斯拉夫人種是黃色人種的混色種，人種的價

値很少。至於勞動階級，在人種上看來，是變質者，是下等人。依據這一學說，世界只有純粹白色人種是最高貴的人種，是天之驕子，世界的主宰，其他一切有色人種及變質的或混血的白種，都只配做他們的奴隸，受他們的支配和剝削。這種以人種或民族來做社會歷史的原動力的學說，完全表現是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胡說。希特勒就曾說過：「世界史上的一切事變都是人類的自己保存的衝動的表現，這種主張，實是德國法西斯主義歷史哲學的基礎。」它們這種胡說，與客觀事實完全不相吻合，因爲事實早經證明：很多的種族，在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現在則落後了。例如當大部份歐洲人還是野蠻人之時，埃及已是極文明的種族了；可是，因爲社會經濟發展的落後，現在埃及人却落後了。

說到人口史觀，同樣也是不正確的理論。無疑的，人口的多少，也成爲社會物質生活中一個重要條件，沒有一定限度的人口，任何社會物質生活都不可能的。因而人口的增長，當然影響到社會之發展，是可以促進或延緩社會之發展的。然而，它也不能成爲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和決定的力量。因爲人口增加這個事實的本身，不能解釋爲什麽

這種社會恰恰爲這一種新的制度所代替，而不是別一個；不能解釋爲什麽奴隸制代替了原始公社制，封建制代替了奴隸制，資產階級制代替了封建制，而不是任何別的制度。假使人口之增長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應當產生與之相當的較高樣式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高過美國四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比中國爲高，因爲在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了。比利時人口密度是比美國高十九倍，比蘇聯高二十六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高過比利時，而蘇聯則較比利時高出一整個歷史時期，因爲在比利時是以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在蘇聯，則已經消毀了資本主義，並在它本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而向共產主義邁進了。所以，人口之增長，並不是，而且不能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

上面所舉社會契約說、地理史觀、人口史觀等，在其本來的意義上，都是機械唯物論的表現形態。但在歷史上，機械唯物論還有它更典型的表現，這就是指的十七八世紀的機械唯物論，爲使它與現代機器唯物論區別起見，又稱舊機械唯物論。

舊機械唯物論，代表着當時已經成熟的革命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這種學說的缺陷，約有三點：第一是不能在社會領域中貫澈唯物論，第二是缺乏歷史主義的觀點，不理解辯證法；第三是帶有直觀的性質，不能理解認識與實踐的統一。舊機械唯物論在歷史——社會領域中的應用，很明顯的暴露了上述三種缺陷。

舊機械唯物論者的社會觀，是從人類之理性的本性出發的。他們把理性作爲一切事物的唯一尺度。凡屬『宗教、社會、宇宙觀、國家制度及其他一切，都要受無情的批判。一切事物，都要在理性的審判之前，證實它自身存在的理由，否則就不能存在。』他們認爲從來的一切社會形態及國家制度都是不合理性的東西，都應當完全廢棄。『世界從來只是由偏見領導而來的，過去的一切東西，只値得憐憫與侮蔑。如今是，太陽的光出現了，理性的王國出現了。從今以後，迷信，偏私，特權及壓迫，將爲永久的眞理，永久的正義，基於自然的平等，以及人間不可分的權利所驅逐了。』（恩格斯）

舊機械唯物論者，不能理解人類的理性原是具有其固有的特殊發展法則的社會關係的總體，而把社會看做是利己主義的個人之單純的機械的集合。他們以爲，在這種社會

之中，各個人的利己主義是互相衝突的，所以人們不單自求幸福，並要爲他人求幸福。爲要完成共同的幸福，就需要完美的社會制度。因此，他們提出了『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的論綱。這卽是說人的好和壞，由社會制度的好壞所決定。如霍爾巴克所說：『不是自然使人變壞，而是我們的制度使人變壞。爲要使壞人變爲好人，就必須有好的社會制度，給人們以社會的道德的教育。』如愛爾勃秋斯所說：『人們完全依存於教育。』他所說的教育，是指社會的影響之總體說的，所以他們主張要改造個人的性格，就必須用一種方法去改造社會環境。這種見解，是他們的革命的要求之理論的基礎。但是說到改造社會環境的方法時，他們就只能看到歷史過程中人類意志的活動，而否定歷史的法則（如霍爾巴克所主張）。因此，他們對於歷史的研究，引出了『意見支配世界』的結論。他們以爲『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而社會環境的性質，又由政府的行動及立法的活動所規定。但政府的行動及立法的活動，是屬於人類意識的活動領域中的東西。』這樣，他們就陷於不能克服的矛盾，並顚倒了歷史發展的客觀眞理。

舊機械唯物論，因爲缺乏了歷史主義的觀點，也不理解辯證法，並且離開社會的實

點，所以不能說明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不能理解社會環境之革命的變革，因而暴露了他們的社會觀之形而上學的、反歷史主義的性質。

舊機械唯物論者的社會觀的缺陷，是由於當時社會生活及科學的發展水準所決定的。可是所謂『人是社會環境的產物』的見解，對於後來的社會思想的發展，却有不少的影響。在這種意義上，舊機械唯物論，可以說是空想的社會主義的先驅。

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傅立葉，聖西門和歐文。他們和舊機械唯物論者一樣，在歷史和政治領域中，都是觀念論者。不過這些空想家的歷史觀中，也有不少『天才的大思想和它的萌芽』。他們把從古迄今的社會的全部過程，分爲四個發展階段：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家長時代，文明時代。而據傅立葉所說，這文明時代，即是資本主義時代，他把文明社會看做比野蠻時代不如的『僞善的存在體』。『文明是用惡的循環和矛盾進行着，不斷的從新造出矛盾而不能解决它，常是到達於自己所要到達它或想獲得它的那種東西的反對物。故在文明之下，貧困生於富裕。』傅立葉的這種見解，如恩格斯所說，表現了很高的智慧。

康德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反映着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之複雜的、曲折的發展道路。康德的社會學和他底世界歷史觀，跟他底全部學說一樣，馬、恩都曾稱之爲「德意志的法國革命論」。（見「神聖的家族」）在康德底歷史觀念論中，表現着在半封建德國底條件之下正在誕生的德國資產階級底觀念形態；在當時的德國，資產階級常動搖於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傾心和對革命暴力的懼怕這二者之間。康德的歷史觀，充分反映了這種兩面性：他一方面認爲人類歷史有向前進步的必要，另一方面却把自然與社會分割開來，把自然作爲必然性所支配的世界，把社會作爲以自由爲原理的倫理的世界，因而歷史是受自由的道德律所支配，這就把歷史發展的規律否定了。

黑格爾底歷史哲學是德國的資產集團和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發展中的一個比較成熟的階段底反映。黑格爾把他所著「歷史哲學緒論」第一章，標題爲「世界史的理性觀」，這便是表明他的歷史哲學即是「世界理性」的歷史觀。黑格爾依照自由發展的程度，把歷史劃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一人自由的東洋；第二階段，是少數人自由的希臘及羅馬世界；第三階段，是萬人自由的日耳曼世界。他說：「東洋譬如人類的幼年期，

希臘是少年期，羅馬是成年期，日爾曼是老年期。」但他又說：「歷史的老年期，不是衰老，而是完全的成熟。」他所說的日爾曼世界之經濟的內容，是資本主義的；其政治的形式，卽是普魯士王朝。

新康德主義的歷史哲學，繼承康德的歷史觀點，並把它發展起來，徹底否認歷史的客觀的合規律性，藉以對抗歷史唯物論。但新康德主義的歷史哲學，也和形式社會學一樣，對於歷史唯物論的鬥爭，是一件無效的武器，所以隨着帝國主義政治的經濟的情勢的推移，就由新康德主義推移於新黑格爾主義。

新黑格爾主義的歷史理論，最初產生在德國。新黑格爾主義的歷史理論的根本觀點，是從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採取出來的，主要的是所謂歷史是精神的過程以及現代國家是有機體的見解。新黑格爾派，從上述見解出發，創出了大資產階級獨裁及對外侵略主義的理論。希特勒曾經高唱『日爾曼民族的優越性，其他民族只配做它的奴隸』和「國家的歷史，是戰爭的歷史，戰爭是最初的人類的存在之永久的形式，國家是爲着戰爭而存在的」等一切狂言謬論，其理論根據，卽反映新黑格爾主義而來，卽此已可證明

在中國，也一樣經過玄學史觀與種種非科學史觀的過程。從司馬遷的「史記」，以至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通攷」，他們雖然已經在歷史學上應用了初步分類的邏輯學，但他們主要的出發點，還是以玄學爲根據的。其中如司馬遷，雖不愧爲中國史學的開山，他開始打破帝王家譜式的斷爛朝報，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游俠日者列傳」等，但他並未進一步以社會經濟作爲歷史事實的根基去探究，也未能從社會人羣之相互的關係上去分析，而祇能從政治的表層形式去說明歷史，所以在究極上，他和杜佑等人一樣，並沒有逃出玄學歷史的圈圈，都是以儒家的倫理觀點來貫穿中國歷史。「史通」作者劉知幾，治史主眞，辨僞甚勤，並規定通史體例，但亦以儒家道統自限，離科學歷史尙遠。

在中國，最初企圖以科學的方法來整理歷史的是梁啓超，他在他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主張把歷史聯系到一切其他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土俗學、地質學、攷古學等科學去研究。然而因爲梁啓超所能接受的，祇是實驗主義的

「科學」方法，而且在他的科學中還保存着不少儒家學說的血統，所以他祇能從現象說明現象，以政治作爲一切歷史事變的根源。繼梁啓超而起的，有胡適，顧頡剛等，因爲他們所承受的衣鉢，依然不出實驗主義的歷史方法，所以他們的史學研究，也就落入觀念論中主觀主義的窠臼，幷以陳腐的進化論爲中心，來否認社會歷史發展中有任何質的突變。胡適說：「歷史好比一百個大錢，你可以擺成兩座五十的，也可以擺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擺成十座十個。」又說：「總而言之，實在是我們自己改造過的實在，這個實在裏面含有無數人造的分子，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裝扮起來；實在好比一塊大理石，到了我們手裏，由我們彫成甚麼樣。」這在胡適的心目中，歷史是「一幅未完的草稿」，留給實驗主義者以「塗改的大權」。這樣，胡適便可以運用其「自由意志」，隨心所欲地創造適合於其自己脾胃的中國歷史。胡適，顧頡剛等，又以長於考證來自誇，可是他們祇能看到個別的零碎的現象，而在現象與現象之間，却無力建立其聯系，更無力理解社會歷史發展之內在的規律。

上述一切歷史理論底基本缺點，總括的說來，就在於它們不能走上眞正科學的正確

道路上去。它們至多祇是考察了人們底歷史活動觀念的動機，而沒有研究這些動機所以發生的原因，沒有找到社會關係系統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沒有把物質生產發展底程度當作這些關係的根源。同時，這些『歷史家』不知道從個人行動底觀點提高到羣衆行動、整個社會類羣行動底觀點上去。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正像恩格斯所批評的一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的變動，卽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歷史全部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從那兒來到人類頭腦中的呢？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麽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

當然，過去一切舊的歷史學，不論是觀念論的，機械唯物的，以至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學和實驗主義的歷史學，都是無力提出這種問題，或至少是無力解決這種問題的。這祇有新的先進類羣，卽無產階級的代表，從社會的經濟發展中，從生產方法和交換方式的變動中，從社會上由此產生的類羣分化，從這些類羣的鬥爭中，去觀察世界歷史的進程，去尋找一切重要的歷史事變之基本原因和決定的動力，建立起新的唯物的辯

論的歷史觀，才有能力做到這一步。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這種先進類型之最早的偉大代表，他們領受了和批判地改造了一切過去社會學與歷史學的最高成果，並把這種社會理論跟實踐聯系起來。這樣，他們就把舊的歷史學和社會學提高到真正科學的階段，他們指示了到歷史之科學的研究底正確道路，把歷史看作一個有客觀規律的、矛盾的、統一的過程。

馬、恩所著的許多歷史著作，如「共產主義宣言」、「資本論」、「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反杜林論」、「法蘭西內戰」、「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德國農民戰爭」及「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等，就是上述歷史唯物論之偉大的建樹和輝煌的範例。

列寧曾經說過：『科學的思想之最偉大的收穫，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歷史唯物論。』而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唯物論發展到更高階段的正是列寧和斯大林。列寧的歷史觀，是在不斷的政治和思想的鬥爭中發展和鍛鍊成功的。列寧曾跟民粹派底唯心論，跟康德主義斯特魯威派底歷史觀，跟俄國的和國際的孟塞維克主義底歷史理

論，跟波格達諾夫底馬赫主義，朴列漢諾夫底機會主義，考茨基底中央主義，托洛斯基底歷史主觀主義，盧森堡和其他「左傾」社會民主派底唯心論和機械論，以及布哈林底歷史學經院主義，跟這許許多多反科學的理論，列寧都做過劇烈的鬥爭。列寧把歷史科學提高到新的階段，給我們以自然和社會歷史的精確性，以究明大衆生活底社會條件和改變這些條件的可能。

在列寧底早期著作「何謂人民之友」一書中，就可看出他是何等集中注意於歷史唯物論底一切基本概念的思索，並如何把它豐富起來。隨後，列寧根於他對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底具體規律和特殊道路的正確理解，根於他對帝國主義的精密分析和實踐經驗，提出了許多有極大歷史價值的新學說，如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律，工農聯盟的主張，革命轉變和新型政權以及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科學論據。例如說列寧所發揚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精密論據，使我們有可能把握住歷史發展底客觀邏輯和這一發展底規律性，那末，列寧底社會鬥爭就幫助我們明瞭先進類羣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歷史唯物論和馬克思恩格斯、其他的戰鬥底思想武器一樣，在列寧底著作「何謂人

民之友」，「兩個策略」、「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中重新復活起來，並變成以活的、具體的政治現實做它底血與肉的理論了。不僅如此，爲了適應新的歷史特點，列寧又把馬克思主義發揮起來豐富起來，在歷史唯物論的寶庫裏面，增加了許多新的元素。

斯大林不但在實際運動的領導上是列寧之後最優秀的繼承人，而且在理論戰線上，也是馬、恩、列之後最傑出的創導人。在跟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及布哈林右翼機會主義作無情的鬬爭過程中，在批判朴克洛夫斯基歷史學派錯誤理論的過程中，斯大林不僅堅強地捍衛了馬列主義，粉碎了各種敵人對於它的曲解和閹割，並且正確地加以闡揚和發展，使之適應於新的歷史階段。斯大林和列寧一樣，決不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爲滿足，而能根據馬列主義的精神和實質，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給以充實和發揮。例如關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關係問題，作爲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之馬列主義的各種戰略戰術問題，對於在蘇聯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現實根據問題，對於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諸問題，對於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條件問題，

以及關於歷史現時期中的知識份子底作用和步入共產主義時期的國家學說等問題，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和「論反對派」等重要著作和在實踐中的具體領導，都給了歷史唯物論及其繼續發展極出色的模範。

尤其是斯大林所著「辯證法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及其直接領導編著的「蘇聯布爾塞維克黨史簡明教程」一書的出版，可以說更給了歷史科學以重大的貢獻。他不僅給歷史科學中許多爭論的問題（如歷史階段的劃分，理論與實踐的統一，人民羣衆在歷史創造上的作用等）以非常精闢的論究，而且圓滿地解決了許多歷史科學的新問題（如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步入共產主義階段的國家存在問題等），更進一步提高了歷史科學的水準，因而也就提高了歷史科學對於社會變革的積極作用。

三

論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阻滯的基因

一 中國歷史之謎

中國社會歷史的保守性和停滯性，一向被稱爲「歷史之謎」。多少人曾經爲着追求這個「歷史之謎」的解答，大傷其腦筋；從來關於中國歷史的論爭，都不能不歸結到這個「歷史之謎」的解答。很顯然的，關於這個「歷史之謎」的研究和解答，不僅是爲了理解過去的中國社會歷史所必需，而且對於現實的中國社會歷史的把握，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知道，人類歷史底過程，不是偶然事件的堆集，相反的，它是人類在其生活的長期鬥爭中所展開的社會經濟形態之發生、發展與更替的相續諸過程。因而人類歷史底重大事件的發生，都是人類社會實踐生活發展的必然結果。例如，現在中國人民所進行

的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運動，把它作爲歷史發展過程底一環來考察時，就可知道它絕不是偶然發生，而是人類社會實踐生活發展底必然結果，並且它本身底發展，也具有着客觀的規律性。因此，對於歷史問題的科學研究，並由此追求出它底客觀眞理性，那就不僅可以清楚認識歷史問題的本身，也就具有着幫助和指導當前解放鬥爭的實踐意義。因而對於中國歷史阻滯或停滯問題的研究和論爭，也就不是什麼經院式的煩瑣論爭，它是反映着各個階層底意識形態，反映着他們對於現實的理解，而從這些複雜錯綜的意識形態的鬥爭中，如果能夠適當地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拋棄謬誤而求出眞理，那就可以正確地發見人類歷史發展底規律，指示出中國歷史的前程。

相反地，一切侵略主義和反動勢力，因爲它們是違反歷史要求的東西，爲了企圖達到它們底侵略目的與反動目的，便不惜汚蔑與曲解對方的歷史。例如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爲企圖征服中國與佔領中國，不但對我們中國實行過經濟的政治的與軍事的侵略，同時也對我們實行過思想的鬥爭。因爲日寇深知中國民族的覺醒，全國人民對於日寇的同仇敵愾，決不是單靠武力所能征服的。不但如此，日寇還懂得「亡人國者必先去其史或

改其史』的奧妙，所以當它對我們中國實行軍事侵略的過程中，就會指使它的走卒秋澤修二等，拚命來僞造中國歷史，杜撰了一本「支那社會構成」，用一切可能運用的新術語，對於中國歷史加以曲解，說中國社會的根本性格，是『停滯』的，『循環』的，而且是『倒退』的。『中國社會在結局上是停滯的，……中國社會的停滯性是社會矛盾的循環，社會過程之反覆的形式，是中國社會的根本性格。』『中國社會和印度社會有共同特性，就是同樣具有亞細亞的停滯性，這種停滯性必須有外力才能打開。』用意是很明顯的，無非是要從『暴力史觀』與『外鑠史觀』的理論基礎上，得出日寇從『九一八』以來攻打中國是『聖戰』的反動結論。其實，『倒退』的倒不是中國底歷史，而恰好是違反歷史必然法則，並被歷史宣判了死刑底法西斯主義。

從此我們也就可以知道，中國歷史的停滯性，所以被稱爲『歷史之謎』，乃是中國歷史的研究，還沒有發展到科學階段以前的產物。當科學之光一旦照耀到中國歷史研究的領域，則所謂中國『歷史之謎』，也就可以逐漸打開，由不可知而變爲可知了。

首先，我們應該運用科學方法，把研究範疇加以確定，那就是我們檢討中國社會歷

史「停滯」或「遲滯」的問題，實際上就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爲什麼特別悠久，這不能說中國社會在這三千年中完全是停滯狀態，沒有一點進步和變化。在理論上說，一個社會制度，決不會完全停滯。在事實上說，中國歷史也和其他國家歷史一樣，經過了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隸制以及由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變革，就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這一歷史階段內來說，自西周以來，也有不斷的變動和進步。例如西周的領主經濟，進到春秋時代，農業生產曾表現有若干進步，手工業和商業也相當發達。特別是到了戰國時代，由於鐵製農具的應用比較普遍，灌溉放肥等農耕技術比較進步，農業生產力是向上了。西漢以後，地主經濟代替了以前的領主經濟，由於農耕技術的較前進步，重農政策的實行，水利事業的重視，農業經濟比戰國時代有一步前進。手工業方面，如煮鹽、冶鐵、冶銅、紡織、造紙等的發達和發明。商業方面也有擴展，而且通西域，到歐洲的國際貿易，正在這時開始。以後經過各種戰亂和破壞，而在唐、宋、明各朝代，中國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也都有新的進步。

由此可見，把中國歷史看成沒有絲毫變化與進步的停滯狀態，絕對不符合於客觀實

際。不過雖然如此，中國歷史雖然表現出有這些變化和進步，而在總的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自周朝到鴉片戰爭這三千年的歷史，終究沒有能夠突破封建社會的界限，終究沒有能夠躍進到資本主義社會。所以雖然不能說是完全停滯，而中國社會發展比較遲滯或阻滯，却也是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知道西歐各國所經歷的封建時期，不過八九百年，就都轉進到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而中國封建社會，則自紀元前一一二二年的西周起，一直到紀元後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爲止，足足綿亙有三千年之久。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社會乃從封建社會變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武裝侵略中國以來，中國又曾一度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在抗戰雖已取得勝利，但除了解放區已經大大削弱或肅清封建勢力以外，其他地區依然還沒有脫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厄運。

正因爲中國封建制時期比較悠久，「當人家還生活於野蠻時代，中國早就產生了燦爛的封建文化，可是當人家過着資本主義文明，我們却還死抱着舊世界，還在亞細亞大陸平原上，唱着東方文明的老調。」這究竟是什麽緣故？這裏究竟藏着什麽祕奧？這就

是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問題，所以引起聚訟紛紜的由來。

二　幾種錯誤觀點的批評

研究這個『中國歷史之謎』的人，有各種不同的解答。過去有人以爲中國在閉關時代所以未能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是由於缺乏自然科學的進步，是由於缺乏蒸汽機的發明。這種倒果爲因論和技術決定論，早已被歷史科學所否定。因爲社會發展的客觀事實已經給我們證明，是先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後有自然科學的需要；並不是先有自然科學的進步，纔有資本主義的產生。是的，中國封建時代的自然科學是不發達的，但是問題的要點，是在於自然科學在中國何以未能發達。雖然自然科學不發達，也可起反作用於社會，使社會發展阻滯，但究竟是屬於第二因了。以社會不能發達所生的結果的第二因，作爲社會發展阻滯的基因，顯然是不合邏輯的。不錯，有了蒸汽機，英國資本主義便蓬勃而起，這本是一種事實。不過，蒸汽機並不像隕石一樣，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當時現實社會的產物。有了市場的擴大，便引起蒸汽機的發明，有了蒸汽機的發明，

便引起了近代工業的發展。祇斷定中國未發展到資本主義是由於缺乏蒸汽機，而不探討蒸汽機之何以缺乏，顯然不是解答問題而是顚倒問題。

呂振羽先生對於中國新學史的建立，有其不能磨滅的功績；但他認爲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基因，「不是由於內在矛盾的規定，而是由於外在矛盾的影響。」即「由於中國所處的葱嶺以東的這塊大陸，有着廣漠的可耕土地，在雅片戰爭以前，四周和境內又沒有更強大更先進的種族來加以阻撓，任中國民族由黃河流域南向長江以至珠江流域的中下游移徙，北向鴨綠江流域移徙，再由東向西移徙。這從一方面說，是中國民族獨得的天惠，給予我們以地大物博人衆的遺產；從另一方面說，這反給了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以阻滯作用。因爲在這種條件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每由於民族的移徙而獲得暫時的緩和。」（見「理論與現實」二卷二期呂著：「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所謂中國社會的停滯性問題」。）則大有討論的餘地，而且顯然陷入了地理史觀的陷阱。

因爲從理論上說，馬克思已經提示得很明白：「整個社會之構造，以及各時代特殊的國家形態之內部最深刻的祕密和隱存的基礎，經常是存在於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對於

直接生產者的關係之中。』(「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這就是說，我們要決定一個社會的特殊形態，必須從其『內在矛盾』而非『外在矛盾』中去尋求。在事實上說，地理環境雖然影響着社會的發展——它加速或阻滯社會發展之進程，但是，『它的影響不能是決定的影響，因爲社會的變化和發展，較之地理環境的變化和發展要快得多。』而且中國民族的移徙，只是中國歷史的一種現象，並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趨勢，也不是經常現象。用中國歷史的一部分現象，當作『阻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主要的條件』來看，顯然不合於實際。我認爲地理環境和外族入侵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阻滯是有影響的，但究竟只是第二因，而不是基因，基因還需要在『內在矛盾』中去找尋，即是需要在生產方法的發展中，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的發展過程中去找尋。

同樣，李達先生是中國社會學的權威，他所著「社會學大綱」是一部不朽的名著，但他對於中國歷史發展阻滯問題的研究和解答，也包含着一些錯誤的觀點。李達先生認爲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有八種，即：戰亂的頻繁，封建的剝削，宗法遺制下聚族而居的農村公社，封建的政治機構，農民階級不能担任新的生產方法，科學的不發達，與當

家學說的影響，地理環境的影響等（見「文化雜誌」一卷二期李著：「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

李達先生在這裏所列舉的八個項目裏面，其中如封建的力役，封建的剝削，宗法遺制下聚族而居的農村公社，封建的政治機構，農民階級不能担負新生產方法等，當然都是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同時，李達先生指出：『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應當做一個全面的研究，把一切障礙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不能孕育新生產力的原因，都要聯系起來加以考察，纔能理解問題的全部。』『其次，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如果主觀的拈出某一次要原因而不去把握那些主要原因，那也不能觸及這個問題的核心。』顯然都是很寶貴的指示，我們只有依據這樣的指示去深入問題的研討，才能得到近眞的結論。

可惜，李達先生自己在他所寫的文章裏面却沒有依照這個寶貴的啓示去處理問題。不僅如此，李達先生也犯地理史觀與倒果爲因的錯誤。關於前者，李達先生說：『我常有一個假想：假使中國與歐洲之地理間隔一直繼續下去，中國社會再過數百年也許還停留在封建的階段中。』這種說法，顯然是公開的外鑠史觀，其違背客觀實際與科學精

神，現在已經可以不辯自明。關於後者，李達先生認爲：「中國的精神文化有一種特殊性，即是知識份子都向着內心方面去用功夫，不知道向外物方面去做研究，所以中國的科學不能發達，因而社會也不能向前發展。」這種說法，顯然是以第二因當作第一因，我在前面已經批評過。

其實，李達先生自己又何嘗不知道，在辯證邏輯上，第二因是不能當作第一因來看待的。所以他接着就加以申明：「這種說法，也只能解釋問題的一個方面。因爲科學是適應社會經濟的要求而發達的。社會經濟如果發達了，科學必然隨着發達起來。封建的秩序，並不需要科學，科學當然沒有發展的機會。中國的精神文化（如儒家學說），雖然鋼蔽着科學的研究，因而阻礙了社會的進步，但科學的不發達，還有其根本的原因，即封建的政治與經濟並不需要科學。假使生產力不受封建關係所束縛而得到發展，科學自必適應於經濟要求而發達起來。人們科學的頭腦，雖受那種向內心做工夫的精神文化所障礙，但科學的頭腦本身，却不因那種精神文化的障礙而毀滅，一旦取得適宜的機會（即社會經濟的要求），自必向着這一方面的發展，創造出科學的知識。所以那種障礙

科學發達的精神文化，只有在它適應於封建的政治經濟之時，纔能成爲阻礙科學發達，阻礙社會進步的助力。換句話說，封建的政治經濟不需要科學，而需要那種向內心做工夫的那種精神文化，人們的科學頭腦，就變成無用的長物，科學也就不能發達了。實際上，歐洲的科學，並不是在封建時代發達起來的，而是在封建社會解體之時纔開始發達的。』既然如此，爲什麽又要說那種向着內心做工夫的精神文化（儒學）是阻礙科學發達，因而也是障礙社會發展的原因呢？這不是明明自相矛盾嗎？

至於李達先生把『戰亂之頻繁』看作爲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而且是第一個原因，也是值得考慮的。固然，戰爭減少勞動力和毀滅生產手段，足以妨礙社會的發展。中國封建時代的戰亂特別頻繁，也特別慘酷。正如李達先生所說：『每次戰爭，斬首數萬至數十萬不等，』『城鄉化爲廢墟，田園鞠爲茂草，牲畜全被屠殺。』勞動力這樣可驚的損失，和生產手段這樣可驚的毀滅，則其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似乎更不消說了；何况『戰亂的期間動輒數十年至數百年，戰亂的區域，波及數百萬或數千萬方里』呢？但是，我們如果仔細加以研究，那就不難知道，這樣處理問題也是不妥當的。因爲

戰亂頻繁，乃是一切封建社會所通有的現象。為什麼西歐封建社會的戰亂，並沒有妨礙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生，而我們中國社會就會受到阻礙呢？李達先生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說：『戰亂雖是一切封建社會所通有的，而中國封建的戰亂，其規模之大，期間之長，却是歐洲封建時代所沒有的。』其實，問題的實質倒是相反的，歐洲封建社會的時期比較短，所以它的戰亂時期也就比較短；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比較悠長，所以中國的戰亂也就比較長久。封建戰亂是封建制度的產物，並不是封建制度是封建戰亂的產物。當然封建戰亂的頻繁，也要阻礙到生產方法的進步，但這又是第二次因，而不是第一次因了。這也是應該弄清楚，而不應該混淆的。

李達先生的文章發表之後，在「文化雜誌」二卷一期上出現了蒙達坦先生所作一文：「與李達先生論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原因」。蒙達坦先生同意李達先生的意見，認為戰爭的頻繁是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一個原因。不過蒙先生感覺到『在這裏橫梗着一個不可不解決的問題，就是戰國之世的戰亂並不比之後少，而且還要頻繁得多，為什麼戰國時的社會發展那樣迅速，之後又發展得那麼遲緩呢？』照蒙達坦的看法，這是由於兩種

戰爭的不同，卽：「戰國的戰爭是領主爲擴張領土而驅迫人民去從事的，戰國之後的戰爭却多是由於農民迫於苛捐雜稅和力役的暴政而羣起反抗所引起來。前者爲封建領主間的戰爭，後者爲農民戰爭。」

爲什麼領主間的戰爭不會妨礙社會生產的進步，而農民戰爭反而使社會發展遲緩呢？我們最好還是先看蒙達坦的回答：

「領主之從事戰爭是爲了擴張領土，對於佔領地的一切生產手段當然是不願加以破壞的，因爲生產手段就是財富的構成要素，而且敵對的一方如果覺得其領土之某部份有被對方奪取的危險時，便從事移民的措置，將可以移動的生產手段都搬走了。這樣，生產手段雖不免仍有所破壞，但畢竟因此保存了許多了。農民戰爭却不然。農民羣起叛亂而引起戰亂，是爲了反抗苛捐雜稅和力役的苛政，並沒有領土的目的。更由於他們的愚昧，故對於不屬於他們自己的生產手段不惜恣意加以破壞。雖然領導農民戰爭的人物，多數抱有領主那樣的目的，但他們也不能完全制止農民的行爲。所以戰

爭的結果，往往城鄉化爲廢墟，田園轉爲茂草，牲畜全被屠殺，生產手段受到可驚的破壞甚至毀滅，這就是領主戰爭與農民戰爭唯一差別的所在。由於兩種戰爭所直接造成的結果不同，其間接造成的結果也就必有差異。前者對於生產力雖有妨礙，但不能根本妨礙其發展，後者則以其破壞及毀滅生產手段之甚，對於生產勢力的發展起着根本的妨礙作用。

由於以上的論述，也是由於戰國之世戰亂頻繁，而社會仍發展迅速的事實，我就斷定農民戰爭是妨礙中國社會發展之一原因，而不及於其他戰爭。其他戰爭雖也妨礙社會的發展，但這種戰爭在其他國家的封建時代亦多有之，不祇中國的封建時代爲然。惟有農民戰爭則以中國的封建時代爲特多，且具有特殊性。以這種中國所特具的事實作爲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原因，是極合邏輯的。」（見「文化雜誌」二卷一期蒙文）

這裏，蒙達坦先生說他自己的論點「是極合邏輯的」，我不知道這究竟是一種什麼邏輯。如果祇是蒙先生自己的主觀邏輯，或幻象邏輯，那當然用不着我們來多嘴。無如

蒙先生的觀點明明是以研究中國歷史的姿態而出現，而不管個人在主觀方面可以怎樣超出周圍的種種事情，他在社會方面總歸是周圍種種事情與歷史條件的產物。從這個立場說，蒙先生對於中國歷史事實的曲解，對於農民戰爭的汚蔑，不管帶有怎樣偶然的性質，也總不能不負有社會的歷史的責任，而中國歷史發展阻滯的基因究竟何在，還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科學研究。

三　農民與農民戰爭在歷史上的作用

中國經歷過長期的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中的人民大衆就是農民。有許多農民被徵募入營伍，成爲兵士，也有些農民失掉了耕地，到了城市，成爲手工業者。這些兵士和手工業者，在基本上還是農民，所以要寫出這兩三千年來的眞實的中國歷史，就應該寫一部以農民爲主角的歷史。

在這長期的封建社會中，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就是農民。「漢書食貨志」寫漢代經濟最發達的時期說：『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

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詩人杜甫寫唐代經濟最繁榮的時期說：『憶昔開元全盛時，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農業生產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基本，而農民是基本的生產者。皇帝、貴族、地主、官僚，無一不是依靠農民而生活。漢代賈誼上書，反對富商大賈之坐食，說：『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小人聚而食之，欲天下無飢，不可得也。』其實不僅富商大賈，一切貴族官僚地主士大夫，都是寄食在農民的勞力之上的。

封建國家的國力，最大部分出在農民身上。田賦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但農民對於封建國家不只出『錢』，而且出『力』。萬里塞外的遠征，以及築長城，開運河的工程，人們常看做是個別帝王的豐功偉績，但沒有千萬農民的力量，那裏做得了這些？唐代的高仙芝曾率大軍越葱嶺而西，近人考古家斯坦因在那一帶考察地形，贊嘆無已，認爲這是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漢尼拔軍隊所不及，這也正是依靠那最能吃苦耐勞的中國農民所創造出來的奇蹟。

在沒有機器的時代，農民只是依憑着他們的雙手；但就靠着無數雙手一點一滴的勞力，農民居然能夠把幾萬萬畝的土地墾成了滋長百谷，供給生活資料的良田。我們如果想到歷史上天災人禍對於農業生產力的反覆破壞，那就更可看出農民的辛勤勞動的可驚。在封建時代歷史上，幾乎不斷地有兵災戰亂，每一次戰亂，常有繼續到數十年之久的，結果在廣大的區域內，田野荒蕪，荆棘成林，千里無烟，農業生產受了重大的破壞；但是戰亂稍平，辛勤的農民又漸漸集聚起來了。他們在廢墟上面重起家宅，在荒蕪的土地上重新墾植，用他們的血汗，重新恢復起了農業的生產。三千年來，中國農民是經常這樣地用他們的雙手抵抗着一切天災人禍，憑他們的堅忍勤勞，供給整個社會以生活資料。

兩三千年間，農具和耕種方法幾乎沒有什麼大的改造，辛勤勞作的農民，始終只是使用着極簡陋的工具，停留在個體勞動的階段上。不可否認的，這是由於加在農民身上的殘酷的封建壓迫大大地限制了農民的創造力。當農民終歲勤勞所得，絕大部分都要爲地主取去，所剩餘的連養活自己都不夠的時候，農民怎樣會有興趣來求工具的改良，耕

種方法的改良，以提高生產力呢？但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農民在自己的勞動生產的實踐中，也還是表現出有很豐富的創造力。封建統治者，一般地說來，對於如何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改進生產方法是不負責的，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如何從農民身上，愈多愈好地搾取其血髓；灌溉事業和對於水旱天災的防止，雖列爲封建統治者的要政，但也往往只是有名無實。所以農民就只能運用他們自己的經驗和智慧，從事一點一滴的改進，作一點一滴的努力。這些改進和努力的成績縱然很小，却是不容人們抹煞。

各種農具雖似乎一向墨守舊法，因襲不變，但其實還是常常有些改進的。像基本的農具——犂，在各地農村中，可以找到種種不同的形式，有極簡單原始的，也有比較複雜，效力也較大的。這從簡單到複雜，很顯然的，是反映着歷史上的長期演進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就有着農民的智慧的運用。爲了運用水力，風力，農民在物質條件的限制之下，也曾很聰明地創造了一些農具。至於如船和車，在歷史上逐漸進步的痕跡也可以看出來，其中也有農民的創造才能的表現在內。爲了和水旱天災作奮鬥，農民也從苦痛的經驗中，創造出些聰敏的辦法，所以認眞要治水防災的官吏，常常要向老農請教。

不能否認，農民的創造力的發揮，是在不自由的情況之下。無論在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上，農民都受着沉重的束縛和壓迫，這種封建統治的束縛和壓迫，阻礙着農民創造力的發揮，同時也就是阻礙着整個社會的進步。

中國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其眞實內容與具體表現，可歸納成下述四點：

(一)、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佔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農民交付地主貴族的地租，也主要是地主們自己享用，不是爲了交換，雖然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交換的發生，但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統治階級——地主、貴族以至皇帝，他們擁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佃農民則很少土地，或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須將辛勤耕種所得的五成、六成、甚至七成，交付給地主、貴族、皇室們去享樂。有些地方，地主可以供給農民以簡陋的住宅，並借給農民以農具，可是農民對於地主的報效，也就更多。這種農民，實際上還是農奴。

(三)、不但地主、貴族和皇室依靠剝削農民的地租過活，而且地主階級的國家，又強迫農民繳納貢稅並強迫農民從事無償的勞役，去養活一大羣的國家官吏及爲了鎭壓農民之用的軍隊。

(四)、保護這種封建剝削制度的，便是地主階級的封建國家。如果說周朝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在封建國家中，皇帝有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權力，在各地方分設官職，以分掌兵、刑、錢、谷等事，並依靠地主紳士作爲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在這樣的社會中，地主貴族官僚紳士，都是脫離生產與驕奢淫逸的「治人者」，只有農民與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力量。可是中國歷代的農民大衆，却在強度的封建經濟剝削與殘暴的封建政治壓迫之下，過着貧窮困苦的悲慘生活。農民與手工業工人都被束縛於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沒有任何的權利，造成農民與手工業工人極端窮苦與極端落後，減低了生產力的機能和改進，這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

來在經濟上和各種社會生活上阻滯不進的基本原因。可惜，中國歷史這樣一個鐵硬的事實，不但被御用的歷史家所抹煞，而且有些自稱進步的歷史家，也不加重視，或甚至竟熟視而無睹。中國歷史發展的阻滯問題，所以被稱爲「歷史之謎」，這就是一個人爲的原因。

封建地主以及封建國家對於農民大衆的殘酷剝削與壓迫，曾經不能不在歷史上掀起無數的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以圖翻身。可見農民不只是在封建社會關係規範以內極有限度地表現他們的創造力，而且還在長期封建歷史中，時時起而作突破這種社會關係的束縛的鬥爭。歷史上常常遇到這樣的時期，整個的社會政治秩序都已支離破碎，机隉不安，在上者惶惶莫知所措，因爲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是因爲除了因循苟且，墨守成規以外，別無其他辦法的。在這時候，就只有從廣大農村中起來的農民力量，成爲打破現狀與展開新局面的動力。

從秦朝的陳勝、吳廣，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黃巾、銅馬，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

國，總共不下數百次，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農民暴動與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沒有的。只有這種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企圖掀掉壓在他們身上的沉重負担，掃除阻礙生產發展的腐朽勢力，才是推動中國歷史前進的眞正動力。因爲每次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的結果，都多少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此也就多少變動了社會的生產關係，與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像蒙達坦先生這樣的「歷史家」，才看不到這種鐵的歷史事實，竟混淆眞相，顚倒是非，反把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責任，無端嫁禍在農民戰爭身上。

至於說到農民戰爭的破壞性，那末這些農民羣衆本是爲掙脫封建階級加在自己身上的枷鎖而起來，其行動假如不具有強烈的破壞性，倒反而是奇怪的事情了。但是我們應該明瞭，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所破壞的，主要是封建秩序，其對於生產手段的破壞，決沒有達到像蒙達坦所誇大的那樣程度。其實按照歷史事實來看，眞正富於破壞性與毀滅性的倒是統治者羣自己所進行的戰爭。如像晉代的「八王之亂」，唐代的「安史之亂」，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封建統治者內部的混戰，對於國計民生，祗有製造許多人爲的災

禍，而不會有一點積極的意義。正如前文所說的，封建統治者在平時是以對農民慘酷的剝削而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而到了「亂世」，更是直接表現爲摧毀農業生產力的劊子手。相反的，在農民方面，在平時，雖受盡多方剝削，還作了偉大的積極貢獻和表現了生產勞動的創造力，一旦拿起武器，自己支配自己的命運時，就往往能更無拘束地爲了自己的利益而發揮其創造才能。不過因爲究竟是在戰爭環境中，農民的創造才能一時解脫了封建統治的束縛，又不能不受到戰爭環境的限制。但雖然如此，農民大衆在武裝鬥爭中，也表現出了有很大的創造才能，例如在太平天國革命運動中，農民不僅用新的方法打仗，而且也用新的方法從事社會的建設，提出他們的社會理想。不管他們的方法和理想都帶有着空想色彩，而在那樣長夜漫漫的黑暗時代中，究竟散發出了可貴的光芒。

講到這裏，自然不免有人要問：既然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可以推動歷史前進，爲什麼中國這樣多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却沒有使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現象有所改變呢？這個非難當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中國歷史本身却也給了我們以最適切的囘答，這就

是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與新的生產方法，沒有新的社會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來領導，正因爲這種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得不到先進階級與先進政黨的領導，就使當時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總是陷於失敗，總是在革命中與革命後被地主階級和貴族豪紳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次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停息之後，雖然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係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這種情況，直至近百年來，才發生新的變化。這是中國歷史的不幸，但是，這一不幸，決不能由農民戰爭來負責，而是應該由封建統治階級及其他眞正阻礙社會發展的因素去負責。

四　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特徵與阻滯因素

上面把中國封建時期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以及生產力的主要因素——勞動力所遇困難，因而造成社會歷史發展阻滯的現象，做了一番概括的分析和研究。但要眞正透徹了解中國社會發展所以阻滯的基因和實質，還必須對中國封建社會本身的特徵，有進一步的探究。

中國封建社會構成的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由於農村公社的殘存與奴隸制發展不充分，因而造成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自給自足的小土地及農業與手工業的強固結合。

我們知道一般的歷史規律，原始農村公社是朝向奴隸制分解的。奴隸制的高度與典型的發展，消解了公社組織。希臘羅馬的奴隸制體系，便是因氏族組織和農村公社之解體而鞏固的。所以柯瓦列夫說：『在各國歷史上，奴隸制度在數量上未達到某種支配程度，公社是不會衰亡的。』(「古代社會論」)中國殷代奴隸制，則發展殊不充分，未發達到希臘羅馬那樣典型，出現了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特殊形態，氏族組織與農村公社，仍以「田」「邑」的名義遺留下來。建立在殷代奴隸制社會廢墟上的西周初期封建制社會，其生產組織，形式上仍以公社為基礎。所以周王把「王有」土地分賜其左右扈從等，多以「邑」「田」為單位，金文中即有很多「賜田」「賜邑」「作邑」「封」的記載。

這種原始農村公社的遺留現象，並不限於中國，在亞洲其他國家如印度等，也有同樣的發現。馬克思曾說：

「印度極古的小公社——至今還有存在的——是建築在土地公有，農業與手工業的直接結合，及一種固定的分工上。……這種自給自足的村社，經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復起來，它們被破壞了，又在原處用原有名稱重新產生。它們的生產結構底簡單，就足以解釋亞洲社會阻滯性底秘密。由此我們可以說明，爲什麽亞洲諸國不絕解體，又不絕重建，王朝也不絕變更，但亞洲諸社會，却很少變化，這個社會基本經濟成分底結構，並不被政治範圍內所發生的風暴所驚動。」（「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編第十二章中譯本二七八——二八八頁）

在另一個地方又說：

「前資本主義的民族的諸生產方法的內部堅實，對於商業解體的作用所表現的障礙，可以從英國對印度和中國的通商明白表現出來。這些國度生產方法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印度還要加上一種建築在土地公有的鄉村公社的

形態，然這也是中國原始的形態。」（「資本論」第三卷）

馬克思在這裏所描寫的事蹟，完全符合於中國封建時代的實際，對於中國社會爲什麼長期被阻滯在封建時代的秘密，提供了一把解決的鎖鑰。在古典型態的希臘和羅馬，那裏氏族社會的末期，勞動已有偉大的分工，手工業從農業分離出來。但在中國却不是這樣，由於農村公社的殘存，奴隸制的發展不充分，竟造成了中國封建時期生產方法及其社會細胞——家族的與公社的——農業與手工業直接結合的前提。在這種結構下，農民分散着各自在一小塊小的土地上用最簡陋原始的工具耕作，以收獲的一半或更多供給於地主（地租形式還是以現物地租爲主），自己享受那剩餘的農產品。並且在自己的家庭中，用最簡陋的工具與方式，製作着爲自己所必要的手工業產品，他們梳理棉花和紡紗，織成布匹，給自己穿著。他們的產品除了交納地租與勉強夠自己應用外，沒有什麼多餘的供給於市場，他們也沒有能成爲市場上商品的顧客。這種以農業與手工業直接結合的農村公社遺制，是中國社會長久阻滯在封建社會的重要因素。土地的兼併之風沒有

使它根本動搖，商業城市的發展也沒有給它以決定的影響，反而它付長期地阻礙着中國獨立的手工業與手工工場的發展，阻礙着商業高利貸資本之轉化爲產業資本，因而也就阻礙着中國社會的向前進步。

我們研究西歐封建社會，不難看到在歐洲中世紀社會底條件之下，在它底生產力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發展着兩種類型的封建的勞動組織和產業：鄉村中用農奴勞動的土地產業和城市中用手工匠人及勞徒勞動的小產業。在某一階段上開始發生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分裂，農業底鄉村和工商業底城市的分裂，是封建的土地產業和城市小產業二者底內部矛盾所促成的。在封建的土地產業底發展過程中，大的土地所有制跟細小的農奴生產，跟農民底私有財產企圖，發生了衝突。這種鄉村中土地所有權底支配形式之直接的內部矛盾，由於封建城市內部矛盾之增長而強烈和尖銳起來。在那種城市中，使城市受封主支配的舊的封建財產形式，和在這些形式中開始發展的新的市民層傾向間的鬥爭，亦正在進行着。城市中工商業底發展，反過來又引起了地主對於農民的農奴制壓制底加強，同時又激化了農民反抗封建統治的鬥爭。這種鄉村和城市勞動大衆底鬥爭，被一個新的階

級——工商業資產階級——利用去達到它自己的目的，它是領導達到新的生產關係體系之革命轉變的一個階級，這就是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之內部的發展法則。而在中國，則因古色古香的農村公社的殘存，由於農業和手工業打成一片，你離不了我，我也離不了你，農村成了自給自足的小天地。不論在農業上或手工業上，生產方法的特色是『祖傳』和『祕製』，其結果必然阻礙社會的進步。

中國封建社會第二個顯著特點，就是中國地主經濟，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三者的強固結合。

有些人以為中國的商業資本早就有了巨大的統制作用，已經把封建經濟腐蝕淨盡，所以——他們說——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已變成殘餘的殘餘了，而中國資本主義也早就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了。這種論調顯然和中國的實際情形不相符合，在理論上也多牽強之處。因為商業資本並不是一種獨立的社會經濟形態，而祇是依存於某一社會形態的經濟成分，它可以存在於古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也可以存在於封建社會，或資本主義的社會。商業資本不是一種生產方式，而祇是一種流通方式。所以，如果認為商

業資本出現之後，封建制度就會隨之消滅，乃是一種錯誤。

中國歷史的眞實告訴我們：商業資本在中國經過了長期的發展，而封建制度則到現在還沒有澈底摧毀；相反地，中國鄉村中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間的結合，還同時保留了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農民的方法和壓迫農民的方法。而這種關係的加強，則只有阻礙中國新生產方法的產生和進步。

在歷史上，高利貸資本與商業資本隨着交換關係的發展而一同出現，即商業的利潤與借貸的利息一同出現。當商業資本在中國社會歷史上開始活躍的時候，高利貸資本也就活躍起來。「左傳」魯昭公三年，曾有晏子關於齊國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的話。而陳氏則是大的封建地主，又是商業的經營者。「戰國策」曾記有馮諼爲孟嘗君「收債於薛」的故事，而孟嘗君也正是大的封建地主。「管子」書中也曾有這樣的記載：「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劵者幾何家？」——這一切事實，都可以看出當時高利貸的發展。而地主又正是高利貸的主人，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一樣地是依附於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爲土地關係剝削形態的旁支。

漢朝晁錯和陸贄對於高利貸的爲害，也都有很深刻的描寫。晁錯說：「農夫無日休息，所入不足充飢。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陸贄說：「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又說：「有者急賣而耗半値，無者求價費倍。」（見「文獻通考」田賦篇引）這種不等價的交換，已使地主兼商業的壟斷者，得以從剝削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之外，進一步地剝取農民必要勞動的生產物，即「剝取其生理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然而事情還不止此。

正因爲最低限度生活資料的被剝取，使直接生產者轉入於更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酷地獄中，即再轉入於地主的高利貸的壓搾中。如晁錯的所謂「亡者取倍稱之息」，陸贄的所謂「無者求價費倍」，這不僅是指示了農民的被高利貸所壓搾，同時又說明了高利貸的利率，在當時就已高到「倍稱之息」和「費倍」，即百分之百。在晁錯的同一文章中，又有「富者積貯倍息」的話，也是一個證明。

由此可知，在封建式的土地佔有和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三位一體的混合剝削形態

下，直接生產者（農民）以全部剩餘勞動的生產物，對於地主，表現爲地租；而又以一部分必要勞動的生產物，對於同一主人，表現爲商業的利潤和高利貸的利息。這樣，地主階級藉地租、商業利潤和高利貸利息——這三種形式，以剝取農民全部剩餘生產物和其一部分或大部分必要的生理最低限度的生活資料。

這裏，已不僅把直接生產者生存手段降低到生理的最低限度，而且這種三位一體的剝削形態，已進一步地使直接生產者的生存手段，降低至於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生理條件的程度。這是慘酷無比的剝削，因爲這種以封建式的土地私有關係爲基礎的三位一體的剝削，使直接生產者『重困疲羸，捶骨瀝髓』。（陸贄語）剝奪了直接生產者的一切生產興趣，剝奪了他們的一切改善生產和擴大生產的可能。這種剝削，又正是絕對地壓搾人民的購買能力，使國內市場緊縮至最低限度，缺乏了擴大再生產的市場條件。這種剝削，使直接生產者於無可逃生的絕望中，轉而千方百計地來死守着這『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直接結合』的殘骸，以企圖苟延自己狗彘不如的生活殘喘，就是使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直接結合反而得到了畸形的凝固。中國歷史的這一特點，證明了馬克思所說：

「獨立生產者，只有在以父子相傳的古老的經營方法，來經營手工業或作農耕的時候，乃有與之相並的高利貸者或商人，即高利貸資本或商業資本的出現，像寄生蟲似地把它們吮吸以盡。在社會歷史中，如果這一剝削形態占優勢，則不會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完全符合於客觀眞理。

中國封建社會第三個顯著特點，就是中國特殊的土地所有權關係。自秦起，土地即從領主獨佔的形式下解放出來，開始在民間自由買賣，出現了所謂商人地主。這一點，與西歐的封建社會發展過程，有所不同。在歐洲，祇有當封建社會解體時，土地才從領主獨占的領有下解放出來，而領主也隨之沒落，退下歷史舞台。中國則不然，封建社會還沒有解體，土地已可自由買賣。而且商人地主代替舊有領主去支持封建社會，成爲封建社會的主要支柱。

土地的自由買賣，爲商業資本開闢了一條大道。在這以前，當土地還被領主所占有的時候，由商業經營所獲得的利潤，除去仍繼續從事於工商業的投放以外，別無他途可循，這就被逼着工商業經營者自己去開始其原始的資本積累，社會生產力由此可以迅速

向前發展，從而刺激着去覓取新的生產方法。但土地自由買賣的路一旦開放以後，事情立刻變更，原來所有經營工商業的資本都湧向土地上來了。因爲購買土地，也是可以增殖貨財的，而且比經營工商業還要可靠，更可藉此以增進其鄉里的地位，直接參加着作政權的活動。工商業增殖的利潤，脫離了工商業的範圍，被土地吸收了去，社會生產力便從此低下，因此便不會有產生覓取新的生產方法的刺激存在，原始的資本積累就這樣地被阻礙。

不僅如此，商業資本自從流進於土地，一面開始收買着土地，一面又轉化爲高利貸資本，以此作爲手段，來控制獨立小生產者和小土地所有者。腐敗的貴族固然要靠高利貸來維持其驕奢的生活，而大部分的農民，爲要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惟有無所選擇地接受高利貸者的苛求。靠着高利貸者的活動，商業資本是被擴大了，土地日益迅速集中了，而農村的生產機構也被破壞了。因爲中國封建時代農業與手工業的密切結合，交換不發達，使工商業資本缺乏活動之餘地，因此土地買賣也就更加成了商人資本投資活動的場所，形成了中國鄉村中商業資本與封建地主間的結合，同時保留了中世紀封建

式的剝削農民的方法和壓迫農民的方法。而這種關係的加強，又轉而阻礙農業和工商業的分化，阻礙新的生產方法的發展，因而也就使中國封建經濟向資本主義經濟轉變時，不能不走駱駝式的慢步，而且表現出異常的吃力。結果，西方人就趕過它的前面，中國被拋落在後面了。

五 中國社會發展阻滯因素的歷史演變

如上所述，都是中國社會發展阻滯的內在因素，而且是基本因素，對於這些基本因素，我已從破立兩方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但是，我們檢討中國社會發展阻滯問題，如果忽略了外在的因素，那還是有缺陷的。事實上，歷代異族，如五胡十六國、北朝、五代、遼、金、元、滿清等的野蠻侵略與入主中國：一方面，直接以軍事的暴力，累次給予中國社會的生產力以殘暴的破壞——如大量地屠殺勞動人口，圈耕地爲牧場，危害科學技術的研究等。另一方面，這些侵略與入主中國的異族，在政治上所施行的殘暴壓制和掠奪，不惟國家的機構直接在妨害生產力的發展，且在間接上，使農民和手工業者在

苛重的負担和約束下，無力改進生產技術，從而又迫使商業資本不斷向高利貸資本轉化。在那強烈地擠壓的情況下，時時有凍餒之虞的農民，爲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而掙扎，便長期地支持手工業與農業直接結合的關係，使新的生產方法，因爲受到阻礙而難以生長。尤其是滿清入主中國以後的專制政治與殘酷的封建剝削聯合起來，變成了幾萬萬漢族人民的『民族牢獄』，使廣大的農民與城市平民做了犧牲，更厲害地抑制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和產生。

如果說，這種外在因素，在從前還只演着次要的作用；那末，雅片戰爭以後，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便成了阻滯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力。雅片戰爭的結局，資本主義列強征服了封建閉關的中國，把中國變成它們的通商口岸，以推銷它們的過剩商品，並開始收括原料，吸吮中國人民的脂膏。自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便步步進迫地以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種各樣的手段來攫奪權利。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挾着它們的新武器，把這古老的社會大門打開，這就使原來的封建社會體制發生激變，附着於這個封建土壤上而繁衍起來的商業資本，必然也要起着若干程度的改變。這一改變的特質，是商業資本家

上了買辦性，又因爲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國家的搾取是建築在它底封建落後性上，並從而與封建勢力攜手以鞏固之。因此，中國商業資本遂具有兩種特質：一是封建的，一是買辦的。新興的買辦階級，爲外國推銷製造品和採購原料，商業活動的對象是增大增多了，因而其觸角更深廣地延伸到每一個農村角落。農民的生產物一部被專業化，專門作爲外製物品的原料而生產，生產這些原料的農民，其全部生活也愈來愈要仰仗於買辦性的商業資本，終於在不等價的交換下作了犧牲。不僅如此，買辦的任務，還須爲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盡力，控制住中國市場上的流通過程乃至生產過程，不但制握着農村手工業的生命，而且還絞殺了一點萌芽的民族工業。中國商業資本自從蒙上買辦性質以後，越發與產業絕緣，而單刀直入地破壞與腐潰着中國社會經濟。

抗戰以後，商業資本的本質隨着時代的進展而起着若干的變革。這種變革的方向說起來是倒退的，而且它的發展日益加重其危害民族經濟的程度，竟至嚴重地威脅到國民的生計，其所以如此，我們不能不感嘆於封建壓力的重大。在抗戰前，商業資本在由國際資本侵入所造成的新場面下，在其提供有利於國際資本活動的狀態下，依靠着它的保

護在一定的被允許的範圍內作其投機的活動，買辦性的成分較大於封建性，而微弱的民族工業也在其鼻息下苟延殘喘。一到抗戰後，情形就開始變化，首先賴以作爲活動地盤的所謂通商口岸，大都被敵人佔領，這樣一來，商業資本的對外依存性就被減縮，其活動的範圍是大大地被削弱了。次之，原來在外資控制下的脆弱的民族工業，這時因爲大都麕集在沿海各地的緣故，也先後被敵人的砲火所毀壞，因之雖然是一個好機會，產業的殖民地外衣被剝去了後，可以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開始其資金的運轉，而一新其生機，却因傳統的封建壓力的強大，仍然作倒退一世紀的活動。

鉅大的游資進到後方來的業績是這樣的：第一，是刺激物價的上漲，由於投機範圍的狹窄，因之即使是未經加工的農村中的土貨也成囤積的對象。囤積的流行，使物價無限止的向上升。第二，物價巨浪的衝擊，使得抱殘守拙的產業經營者也感到惶惑，索性也學着兼營商業，囤些原料。影響所及，生產由此而日趨萎縮。物資的缺乏，又轉過來使商業資本增大其氣焰，逼着物價再向前跑步。但是有限的物資，終究容納不了這些大量游資的活動，於是土地的買賣與商業資本的結合，又重新走上過去的道路，土地與土

地生產物，終於成了商業資本之最可靠和最有利的投機對象。

商業資本的流入於農村，流入於土地，並不能使農業生產物從此可以豐富起來；相反地，流入於農村中的資金，並不是拿去投資在農業生產上，而是向農產品投機，來作爲囤積的對象。以佃農貧農構成爲今日農村中的多數者，這時就直接受到打擊，因爲在他們手裏的農產品是那樣地稀少，平時還需要靠着另外購買，這時因價格的上漲而更陷於貧困。土地方面，由於戰時幣値慘跌，實物遂爲人所重視，且因物價高漲，一般收付皆改爲實物，於是土地和土地生產物的價格日被提高。同時由於土地的固定性，以及其具有高額地租及土地漲價等等的性質，都使得一般有錢的人將其資金大量的投在這一方面。但是土地投資的增多，並不是說土地的生產將得到改良，相反的，地主們因受到地價上漲的影響，無例外地都把地租增高，且有那些中世紀式的封建的額外苛索出現，其搾取之繁密，實已超過一般佃農負担的限度。糧價上漲的利益是爲地主所獨享，而佃農所賴以糊口的雜糧，亦不能避免地主的徵收。佃農的生活狀況於此卽可想見。除此以外，佃農經常地還要遇到地主退佃的威脅，這一連串的打擊，使佃農最後祗有離開土

地。至於半自耕農和貧農，其情形亦復相同。他們如果要想維持簡單的再生產，只有乞靈於高利貸的一法，而高利貸就正是地主階級剝削農民及至吞併土地的武器。

土地利用論者不考察這種實際情況，祇知從技術觀點提倡農地改良與作物增產，而不從政治觀點爭得農地改良與作物增產的必需條件。他們不知道商業資本流入於土地的結果，是增加着農業的危機，促成農村的破產與崩潰，是使社會生產資金日趨萎縮，把小農個體經濟與工業經濟的矛盾越加擴大，工業資金的積累過程更無從實現，這種情形直接反映在政治上面就是種種保守倒退的現象。這是歷史的逆流，是社會經濟的反動表現。

由此可知，我們若不明白中國社會經濟的特殊內在條件，祇知從技術方面提倡農地改良與作物增產，或空談工業建設，以爲有了機器的設備與外資的援助，事業就可以順利發展，這是絕對錯誤的一種想法，過去歷史已經替我們證明，將來的事實還要繼續給我們作證明。機器的設備，固然可以節省人力與提高生產，但更重要的還是改善生產關係，祇有提高直接生產者的社會地位，才能激勵他們的生產興趣。外資的援助，固然有

其需要，但不能單純的依賴着它，因爲單純的無條件地依賴外資，其結果必然使民族工業受到外資的操縱，而重複於過去的附庸地位，這是要陷於歷史的倒流，爲我們不能不特別加以警覺的。

中國需要工業化，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但工業化的基本前提條件，不是如一般人所講的那些屬於技術性範疇內的事情，乃是屬於政治範疇的事情。因爲工業建設是關係於自身整個社會體制變革的事情。所以我們只有從社會性的範疇內去了解，從社會的發展中去尋求解決途徑。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日本侵略者滅亡中國的計劃已經破產，英美法等國對我們中國都正式訂立了平等新約，表面上中國且已列爲四強或五強之一，但在實質上，中國民族解放的任務並未完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枷鎖尙未完全解脫；同時，加於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桎梏之封建壓力，無疑的還是全國人民的重担，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都尙待爭取，民族工業正陷入深重的危機，許多工廠都不斷瀕於破產。而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則依然被不合理的封建土地關係所束縛，這種封建的土地關係，大大阻礙着社會的進步。

要使中國成爲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一面固須求得民族的眞正獨立和自由，一面又要求有一個合理的土地關係的建立，必如此，才能剷除封建的落後性，而工業化又是和合理的土地關係密切地關聯着的，工業資本的積累，也因此而才能完成其歷史的任務。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得到解放的許多歐洲國家，如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等，在其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中，給了我們不少示範。他們將民主的實現與土地改革，不可分離地聯系在一起，這就使國家民主化的工作眞正打下基礎，而要保障這些要求的實現，首先是要造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制度。祇有實現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才算澈底完成了中國社會發展阻滯因素的變革任務，而中國歷史也就因此開始了新的篇章。

一九四二年五月初稿

一九四五年九月訂正